

中国学术界的问题及其出路

亦明

摘要 中国学术界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学术腐败。学术腐败不仅危害学术界本身，它还危害整个中国社会，并且腐蚀中国的下一代。但对学术腐败的根源，却有许多不同看法。本文提出以下观点：造成学术腐败的根源之一是中国学术界的学术水平低下，而造成学术水平低下的原因并不是政府资金投入过低，而是中国学者的个人素质太差。本文着重讨论了学者素质问题，并且从文化传统、政治环境、教育制度这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学者素质低下的原因。最后，针对中国学术界的三个问题，学术腐败，学术水平低，学者素质差，笔者提出整治、挽救中国学术界的三个相应对策。

内容目录

- 一 前言：学术腐败只是中国学术界问题的表象
- 二 学术腐败的根源是中国学术界学术水平低下
- 三 学术水平低下的原因不是政府投入过低
- 四 学术水平低下的原因是学者个人素质太差
 - (一) 一个学者应该具备什么素质？
 - 1 素质的概念
 - 2 学者的定义
 - 3 孔子的学识
 - 4 屈原的胆识
 - 5 蔡元培的人格
 - 6 胡适的见识
 - 7 科学家的素质
 - (二) 当代中国学者的个人素质
 - 1 没有自知之明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 2 不懂得自尊自重的北京大学校长
 - 3 丧失了羞耻感的院士
 - 4 缺乏常识的高教精英
 - 5 人格畸形的流氓教授
 - 6 天良泯灭的“中国杰出青年”
 - 7 出卖色相的“美男”教授
 - 8 具有黑帮政客特点的中国新生代学者
 - (三) 当代中国学术界的整体素质
 - 1 不伦不类的“知识创新工程”
 - 2 莫明其妙的“985工程”
 - (四) 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学术界

五 当代中国学者素质低下的原因

(一) 历史、文化因素

(二) 政治和社会因素

(三) 教育因素

1 愚昧的知识教育

2 浅薄的技能教育

3 虚伪的道德教育

六 中国学术界的出路何在?

(一) 斩草除根，擒贼擒王：铲除腐败之源——院士制度

1 中国目前的院士是腐败制度的产物

2 中国的院士制度腐蚀了学术界本身，败坏了学术界的风气

3 中国的院士制度不同于西方的院士制度

4 中国的院士制度遏制中国科技的发展

(二) 归真返璞、顺天应理、量力而行：让学术界对社会有用

1 大学的理念：大学是搞教育的地方

2 学术研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3 引入竞争机制，建立全新的学术系统

(三) 以人为本，放眼未来：用新文化培养下一代

七 结语

一 前言：学术腐败只是中国学术界问题的表象

2004年初，我的文章《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开始在网上流传。由于那篇文章对中国目前的学术界做出了几乎是全面的否定，所以我做好了收到猛烈回击的准备。不过，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实际上，对那篇文章公开持反对或批评意见的读者几乎没有，连一个对凡是批评学术腐败的文章就一定要叫骂一番的“科教”网站，除了动用既不科学又无教养的手段——删贴——之外，再就不置一词。绝大多数读者对我的文章持支持态度。这使我相信，我对中国学术界目前现状的估计和评价是准确的。请看下面的部分回帖(括号内为网站名称和网友笔名)：

“哈哈。楼主写得太顶了。全力支持!!!!所有的人，凡进了学校，就像被扔进了染缸，不管你是白的，黑的，黄的，绿的，紫的，都被染成清一色——黑色!!!这是我们社会的悲哀，国家的悲哀。做为这当中的一员，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无权，无势，无钱，只能遭蹂躏，被欺负。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天啊!!!!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天涯社区—天涯杂谈》xueyan2003)

“学术界早就黑了，真正有能力的好老师在学校里处处受压制，经济上也很清贫，那些顶着学者帽子到处招摇的人却爬的比谁都高，大把大把的在校内校外捞钱。”(《天涯社区—天涯杂谈》释迦山)

“现在在我们这里社会里，会有一种无奈，因为你会被一种东西淹没掉，如果想生存下来，那就成为他们的同类吧。”(《天涯社区—天涯杂谈》关心自己)

“看了伤心呀!我还是年轻人，中国该怎么办!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处境，就像一个蒙着

眼睛站在悬崖的人一样！下一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天涯社区—天涯杂谈》我是 sand）

“好文！这个社会实在是病得不轻了！学术腐败非常可怕，因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看来需要全民一致，反对学术腐败！需要每一个人都发出自己的声音。顶！！！”（《天涯社区—关天茶社》虎啸岗）

“绝对好文，盼望高层领导能够看到本文的心情就像嫦娥盼望见到青天大老爷一样啊。”（《天涯社区—关天茶社》一个农民）

“现在大学里，不弄虚作假的人只能吃亏，弄虚作假很正常，所以大家都弄虚作假。”（《搜狐星空论坛》monkey）

“在中国做学术，穷途末路；玩学术加玩权术，前途无量，金光大道。有几人能耐得住寂寞，有几人甘愿清贫，有几人还有学者的良知。莫大的悲哀啊！！！”（《千龙网—千龙大会堂》一游客）

“没有人能够想象一个科研人员心中的绝望。”（《千龙网—千龙大会堂》一游客）

“好！揭露的让人痛快！如此的学术腐败，龌龊的学术，社会风气，不知要带领整个中华民族的教育迈向何方！！整个社会都活在重重的虚伪中，悲哀啊！！看来要么不回国，回国也不在高校做科研，不如去企业搞研发算了！！！”（《文学城—大学春秋》腐败！！）

“写得中肯，中国的学术腐败是世界罕见的，建议网上征集签名，寄给胡温两位大哥看看，寻求紧急刹车对策。”（《万维读者网络—学术与教育》齐义鹏）

“天啊！伤心啊，难过啊，我现在打字都恨不得把键盘敲破。希望还能有一点点希望啊”。（《搜狐社区-海外论坛-海归一族》redman）。

这些回应中，对我震撼最大的是网友们那些迷茫的发问、无奈的哀叹、深深的绝望、和谦卑的述求。

确实，揭露学术腐败并不是我写那篇文章的最终目的。我实际是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根源，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行之路。无庸讳言，面对中国学术界目前所患的如此重症，这个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社会腐败，世界上决不会有一个现成的、简单易行的方法能够将它根治。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也曾陷入无尽的迷惘之中。但是，读者的回帖给了我继续探讨下去的决心和勇气。虽然在目前的中国学术界，腐败势力看上去不可一世，但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曾经有过多少不可一世的势力在顷刻间土崩瓦解的事例呢？再者说，腐败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毁灭的过程，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任何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腐败分子的命运也注定是走向灭亡。这么一看，应该感到悲观绝望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些在腐朽的粪坑中不可自拔的学术败类。

那么，我们是否就应该坐等这些败类的自我毁灭呢？不能。因为他们在自我毁灭的过程中，还会把整个中华民族也拖入灾难的深渊。在《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一文中，我曾说，学术腐败是中国社会的心腹大患。我这么说的原因就是，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侵蚀的主要是一个国家的物质基础，腐败分子侵吞的是社会的物质资源。而学术腐败则不同：它不仅侵吞物质财富，它还腐蚀一个国家的智识基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不仅如此。“学术腐败是吏治腐败、经济腐败势力的宣传部、后勤部、培训部，他们为社会上的腐败势力造舆论声势，给他们提供精神给养，为他们培养后续人材。”腐败的中国学术界正在通过教育这一最有力的方式，名正言顺地腐蚀着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治理好，但只要学术腐败继续存在，其他社会腐败现象就会象扑不灭的野火一样，有随时随地爆发、复燃的可能。学术腐败不除，中国，中华民族，就永远也不会达到我们本来应该能够达到的物质和精神文明高度，就将永远地在自我倾轧、自我欺骗、自我堕落中沉醉、满足。

所以，我们要主动地铲除学术腐败这颗毒瘤。我们不能让它把中国的学术界、把中华民

族也一同拖入灭顶之灾。如果是那样，我们，也就是中国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历史老人的眼中，就会变得和败类一样，成为历史的罪人。

但问题是，清除学术腐败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吗？也就是说，假如学术腐败真的能够被清除，中国学术界的问题就解决了吗？清除了学术腐败，中国的学术界就具备了承担“科教兴国”大任的能力了吗？当然不是。如果把中国的学术界比作一个人的机体，那么学术腐败就是遍布在这个机体上的恶性肿瘤。很明显，切除这些毒瘤，也许能够保证中国学术界继续存活下去，但决不会保证它能够健康地、正常地成长，更不会保证它能够国际学术界的奥林匹克竞赛中夺得好的成绩。反过来说，这些毒瘤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学术界猖狂繁衍，正说明它还有更大的隐患。

二 学术腐败的根源是中国学术界学术水平低下

一般认为，学术腐败现象在中国的大规模出现只有十余年的历史。那么，它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中科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杨弘远认为有四条原因：学风与学术道德教育贫乏、学术民主空气淡薄、学术道德法治空缺、政策导向有偏误。（杨弘远：《治理学风要抓住“病根”》）。在2003年一期的《北京评论》上，有一篇文章专门报道了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探讨学术腐败的根源。这些根源是什么呢？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院士认为：“这种现象的存在与整个社会急功近利、追求名利的风气比较盛行很有关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李延保也说：“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诚信受到了挑战。”中科院院士郑时龄则把抄袭剽窃的部分原因归咎于“学术交流不畅通”。还有人把学术腐败归罪于“体制”及缺少舆论监督。（佚名：《学术腐败因何而起？》）。2004年，在全国人大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张恭庆说，学术腐败的原因要从我们体制上去寻找。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则说，政策导向不当助长浮躁风气。而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小谟则认为：学术界的浮躁风气是学术腐败的根源。（佚名：《五位“院士代表”痛斥学术腐败》）。总而言之，中国的这些院士、这些领袖们几乎一致地把学术腐败的“原罪”归咎于客观原因。

应该说，中国学术界的领袖们能够公开承认学术腐败的存在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曾几何时，一些大学校长、人大代表还在媒体上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奚彬、翟伟：《人大代表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中国科协的“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工作委员会”甚至要把学术腐败改称为“学术界的不端行为或不良行为。”（孙自法：《科协呼吁改称“学术腐败”为学术不端或不良行为》）。即使在被全国人民痛斥了一年多之后，这个委员会仍旧不改初衷，在中国科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继续用“不端行为”来替代学术腐败。（孙自法：《中国科协披露当前中国学术七大“不端行为”》）。在2004年的全国人大上，北京大学校长还这么说：“学术腐败，是指对科研成果的剽窃、抄袭等，在国际上一般叫做‘科学界的不端行为’。”（佚名：《五位“院士代表”痛斥学术腐败》）。尽管如此，“学术腐败”这个词汇已经在中国的现代语言中牢牢地扎下了根，并且被全世界的华人所认同和接受，而对这一现象的记录和分析将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必不可少的篇章。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无法逆转的。

但是，与扭捏作态、羞羞答答地承认学术腐败现象的存在相反，中国学术界的领袖们对中国学术界面临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却讳莫如深，绝口不提。这是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整体学术水平的连年下降。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2001年初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连续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24位滑至第29位，科学技术由第13

位滑至第 28 位，国际竞争力由第 24 位降至第 31 位。(冀文海：《中国高等教育持续滑坡，8 成大学生对高校教育不满》)。2002 年，中国经济的成长竞争力在全世界的排名是第 38 位。到了 2003 年，中国的排名降到了第 44 位，排在波兰之前，南非和斯洛伐克之后。(World Economic Forum. 2003.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3-2004)。而在此期间，台湾的科技竞争力则从 1992 年的世界第 19 位猛升为 2000 年的第 10 位。

学术界的存在价值不就是在提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及学术水平吗？对关系到自身存在价值的这么严重的问题，中国的学术界为什么能够如此麻木不仁呢？它说明了什么呢？实际上，中国的学术界对这个关键问题绝口不提正说明了它的问题所在。这就是：学术水平的低下是学术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学术腐败现象的出现过程大致是这样的：中国的学术界经过八十年代的人员大流失，即智商较高的学人离开学术界(出国、从政、经商)，“随着文革前的学者全面退休，中国学术界的实权从平庸之辈的手中转移到了那些被‘筛选’下来的碌碌无为之辈的手中。他们掌权之际，也恰逢‘科教兴国’战略实施之时。金钱象潮水般涌入学术界，对于搞不了学术的这些人来说，搞腐败就成了唯一的选择。”(亦明：《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

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界面对着如同泰山压顶般的“科教兴国”重任，面对着如同潮水般涌来的金钱，它既感到茫然若失，束手无策，又感到了金钱从毛孔中渗入时的兴奋和激动。最后，它找到了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这条“捷径”。按道理讲，受到过高等教育、并且留在学术界工作的人，一般都有一定的事业心，也就是想要在学术上干出一些成就。但有限的知识和才能在无限的压力下，使他们素质中最薄弱的一环，也就是道德约束，发生了断裂。而金钱的存在，对中国的学术界来说，既是诱惑，但也同时使它丧失了无所作为的最大借口，那就是“政府的科技投入过低”。这就象一个学习成绩一般的孩子，却被父母逼迫一定要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一样，除了走邪门歪道之外，再别无选择。

中国学术界的学术水平到底有多低？看一下代表中国学术最高水平的院士就一目了然了。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章程》和《中国工程院章程》，“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国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也就是说，院士是法定的学术权威。可实际上，抛开这些院士的道德水平不提(详见笔者“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系列文章)，他们的学术水平之低，完全可以用“难以置信”四个字来概括。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洪国藩领导的“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项目，它曾在 1998 年被两院院士推举为“1997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的首项。可是，这项代表着中国科学最高成就的研究成果，其论文竟然只能发表在一个影响因子只有 0.5，也就是相当于“学术垃圾”的刊物上。如果说这个项目本身只能说明洪国藩院士个人的学术水平的话，那么两院院士推选这个“成果”为“1997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第一名则说明了中国院士的整体水平：他们比洪国藩还要低。

另一个能够说明中国院士学术水平的例子出现在 2003 年。当时，非典瘟疫肆虐中国大地，对病原菌的鉴定成了非典防治的关键。本来，对于搞传染病学的人来说，病原菌的鉴定工作虽然谈不上简单容易，但却可以说是已经程序化了。加上研究方法的改进，任何一个受过专业训练、并且有过几年工作经验的人都应该能够胜任此类工作。而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领导的科研队伍，却犯下了极为低级的学术错误：他无视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的传染病病原鉴定的金科玉律——科赫法则，而仅根据电子显微镜照片来鉴定病原。结果，他把冠状病毒误认为衣原体，从而把自己的科学研究及政府的防治政策引入了歧途。这个被国际同行评价为“违背常识”(“against common sense”)的学术错误，其直接后果就是使中国政府丧失了宝贵的时机，使非典成为建国以来危害最大的瘟疫。不仅如此，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在全世界最丰富的生物材料面前，中国的院士连像样的关于非典的科学论文都没有发表一篇，倒是在国内的新闻媒体上一会儿吹嘘找到了“非典克星”(杜若原、傅先萍：《抗 SARS 药物

被找到：了不起的武大病毒研究中心》)，一会儿又叫嚷“找到了打开非典病毒大门的‘钥匙’”（张瑾：《贺福初院士：病毒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实际上，用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的话说就是：“在 SARS 面前，我们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谢湘、周欣宇：《SARS 面前中国科学家打了败仗》）。

其实，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并不奇怪。因为从整体上说，中国院士的学术水平大抵相当于欧美国家三流科学家的程度。这一点，连中国的院士们自己都不得不承认。2001 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在谈到“有人认为，中国院士的总体水平恐怕连美国二、三流大学教授的平均水平都达不到”这个问题时说，“很难把不同国家的院士水平进行比较。……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代表了中国学术界的优秀学者。”（张其瑶：《许智宏谈中国院士水准问题》）。2003 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也说：“国外有很多人认为中国院士水平不高，有一定道理，但中国的院士首先要看他对中国科学发展做出的贡献，其次才是国际影响。对前者，外国人是无权评论的。”（欧阳斌：《中国学术纯度加剧下滑》）。

不过，这两位院士强调的中国院士的特殊性，很难让人信服。首先，把中国院士的学术水平与国外院士进行比较有什么难的？难在哪里？科学研究实际上是整个人类对未知世界的开发和探讨，是全人类参与的智识竞赛。就象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一样，哪个国家的运动水平如何，通过奖牌的计算一般就可以立见高低。而在学术界，类似奥林匹克那样的比赛在时刻进行，怎么能说很难比较呢？其次，如果一名院士的标准仅仅是“对中国科学发展做出的贡献”，那实际就是在承认他对世界科学根本就没有什么贡献。而一名对世界科学没有什么贡献的科学家，又如何能够对中国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呢？那不就是所谓的低水平重复吗？第三，就算这二位院士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为什么伴随着“对中国科学发展做出贡献”的中国院士人数剧增，中国的整体学术水平反而大幅度下降呢？

实际上，如果按照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来衡量的话，有人甚至认为美国一流实验室的研究生的水平就要相当于中国的几个院士。（苦口药：《一个留美科学家的学生相当于几个中国的新院士？》）。2004 年，复旦大学首席教授、中科院院士王迅直言不讳地告诉国人，若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标准来衡量，目前复旦大学物理系够得上教授水平的一个也没有，他自己“可能”够得上副教授水平。（任荃、王丹红：《中国科技界：直面现实》）。即使如此自我贬低，很多人还是认为王院士高估了自己。

中国科技水平的高低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判断。曾获得过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无缆水下机器人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和获得 2003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等项目，其技术基础均来自国外。这些成果不仅科学成分极少，即使是技术含量和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也不是很高。“神州五号”上天反映更多的是中国的经济实力，而不是科技实力。这一点，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并不否认。比如，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陈怀瑾说：“从技术和应用上来说，载人和不载人航天并没有本质区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庄逢甘说：“往返技术怎么做在（20 世纪）80 年代曾经争论很大，中国到底是走英法的路子，还是走俄罗斯的路子？做了大量论证之后确定了载人飞船。”中科院院士、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梁思礼说：“神舟飞船可以壮国威，体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主要体现的是中国整体的航天技术实力。在单项上，中国和美俄比还有差距。”（吴珊：《神舟，你有多少含金量？》）。也就是说，神州五号上天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政治意义大于科学意义。它的关键技术是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存在的，并且是国外的。

除了上面这些，中国学术界的水平还可以从中国的大学反映出来。据认为，中国的顶尖大学，也就是北大和清华，在世界大学中的排名位于 200 名之外。它们不仅在世界上落后，即使在亚洲也算不上一流。有人统计，在 2000 到 2002 这三年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这六所全国最强的学校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总共发表了 27 篇论文，仅及哈佛大学的 6%，剑桥大学的 15%，东京大学的 20%。(武书连、吕嘉、郭石林：《2004 中国一流大学评价揭晓 15 所大学入围》)。考虑到这六所大学的规模(师生人数)都至少在哈佛大学的两倍以上，因此可以说，一所哈佛大学的科学产出相当于大约 200 所中国一流大学($12 \div 6\% = 200$)。这就是中国学术界与世界一流的差距。另外，根据发表论文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论文引用率，来衡量，2002 年中国的物理学在世界上 82 个国家中居第 66 位，与新加坡、白俄罗斯、古巴不相上下。排名最高的中国大学是中国科技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为第 551 和 552 位。靠在国内刮起 SCI 旋风起家的南京大学，其化学论文总数在 1992-2002 年间排在世界第 41 位，但如果按平均引用次数来计算，它的排名却一落千丈，居第 675 位。(缥缈孤鸿：《可怜的中国物理！可怜的科技、北大、南大、复旦、清华！》)。所以说，中国的学术界正在加速制造学术垃圾。

实际上，中国学术界的学术水平目前是在从低下向更低发展。1999 年，教育部实施《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评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由于每年评选出的论文以百篇为限，因此当选的论文被称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论文能够当选，不仅博士本人能够得到教育部颁发的数十万元科研经费，对其所在学校也是巨大荣誉。什么样的论文能够入选呢？根据评选标准，它们必须“选题为本学科前沿，有重要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在理论或方法上有创新，取得突破性成果，达到国际同类学科先进水平，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或应用前景；材料翔实，推理严密，文字表达准确。”按道理说，中国每年授予数万个博士学位，百里挑一，总应该挑出几个像样的吧？可结果是，清华大学的一篇入选论文被国际学术界一致评为“质量确实很差，在理论上基本是错误的，也没什么应用价值”。(李丽萍：《质疑“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一入选作品》)。这就是中国科学的未来。

很显然，想要依靠水平如此低下的学术界来承担振兴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重任，无异于赶鸭子上架。鸭子当然上不了架，所以它们只好呱呱乱叫，瞎扑腾。

三 学术水平低下的原因不是政府投入过低

科学技术水平低下是中国的长年痼疾。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国的科学家除了在少数领域，如国防科学，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外，其他能够引起国际学术界重视的成果大概只有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工合成胰岛素一项。(王渝生：《中国科技百年》)。为什么中国的科技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呢？

毋庸否认，学术腐败是造成目前科技水平低下的原因之一。但上面提到，与其说学术腐败是学术水平低下的原因，倒不如说它是学术水平低下所造成的结果。二者之间的恶性循环混淆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早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学术界就曾把中国科技水平低的原因部分地归咎于国家投入不足。即使是现在，不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华人科学家几乎还是众口一词地把中国科技落后归咎于投入过低。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著名华裔分子生物学家吴瑞就在最近的《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对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支持强度太低”。(吴瑞：《提高中国科学研究的产出率面临挑战》)。与此相呼应，《文汇报》的一篇文章开头是这样的：“这是一组耐人寻味的对比——2003 年，我国经济实力位居世界第 6，科研经费投入却只有美国的 1/20；2000 年，中国在生物学相关领域发表的具有国际水准且较高影响力的论文，不到美国学者的 4%；有关研究表明，我国仅有 15% 的学科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而 85% 的

学科与世界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任荃、王丹红：《中国科技界：直面现实》)。这篇文章透露，中科院的一位研究员就认为，“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远少于美国，而对生命科学的投入更少。这个投入比例的严重失衡可能是中国高水平产出远少于美国的根本原因。”(引文同上)。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从 1995 年“科教兴国”政策实施以来，以及实行教育产业化之后，进入中国学术界的政府资金和民间资金可以说是成番论倍地增长。目前，不论是就资金的绝对总值，还是就相对购买力而言，中国的学术界都可以说是相当富裕的。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实验条件和研究经费，即使与发达国家相比，不仅毫不逊色，而且足以使对方自叹弗如。按绝对值来计算，美国的科研开发(R&D)经费总额确实比中国多出大约 18 倍，在 2002 年达到 2762 亿美元。但这其中，超过三分之二是来自美国的企业界，而联邦政府的科研预算中，用于军事研究的经费超过一半。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的统计公报，2002 年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支出为 1288 亿元，比上年增长了近四分之一，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23%。这其中，大约三分之二来自政府部门的拨款。由于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远远超过官方汇率，因此中国和美国的科研经费总额的真正差距比绝对数值所显示的要小得多。另外，美国科研经费的大部分用于人员开支，而中国科研经费中，这方面的支出除了各单位允许的个人“提成”之外，可以说微乎其微。(中国政府在 2002 年还支付了约 700 亿元人民币的科技三项、科技事业等费用)。因此，相对而言，中国科学家所得到的科研经费比美国科学家得到的要多得多。

从另一方面来说，2002 年美国有科技人员 470 万人，其中超过 300 万人拥有所从事领域的最高学位(一般是博士学位)。而根据中国科技部的统计资料，2002 年中国在县以上科研部门从事科技活动的只有 20 万人，而在地市级所属科研机构工作的只有 4 万 2 千人左右。这 20 多万人中，能够被称为科学家或工程师的只占三分之二，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数是 7800，拥有硕士学位的人数是 15939。即使再加上高等教育界的科技人员(2001 年为 16.8 万人年)，中国科技人员的人数也不过是美国的 5% 到 10% 左右。如果再考虑到质量因素(人员的科学素质)，其比例只会更低。实际上，根据吴瑞的估计，中国生命科学界具有“高产出率”的科学家仅及美国的 1% 左右，而根据中国的国情，这些“高产出率”科学家都控制着大笔科研经费。他们每人平均科研经费实际是美国同行的几倍、甚至十几倍(按实际购买力计算)。如果承认这些数字的真实性的话，那么请问：中国学术界还要国家增加投资，理由是什么呢？那么多的钱，你们想怎么花呢？

据了解，那些学术界大户，如中国科学院的院所和进入“985 工程”的大学，都有花不完的钱。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就鼓动自己的属下，在申请科研经费时，要有“大手笔”。(中科院微生物所：《陈竺副院长来我所宣布所领导班子组成并作重要讲话》)。据报道，浙江大学在过去八年间的科研经费每年以一亿人民币的速度递增，在 2002 年达到 8 亿元，位居全国高校第二位。(徐有智、叶辉：《浙大实施 985 工程巨变：科研经费每年增长 1 个亿》)。如果按实际购买力计算，这个数字完全可以与美国一流大学相比。(2001 年，美国投入研究开发经费最多的 10 所大学，每所学校的平均投入是 6.0 亿美元，排名第 11-20 的学校，平均值为 4.2 亿美元，排名第 21-40 的学校，平均值是 3.1 亿美元)。(见美国《自然科学基金报告 31-316》)。而浙江大学与美国一流大学在科研水平方面的差距到底有多大，看看这个数字就清楚了：2000 年到 2002 年，浙江大学在《科学》和《自然》杂志上总共发表了两篇论文，不到哈佛大学的二百分之一。(哈佛大学 2001 年科研总经费在美国大学中排在第 22 位)。中国有些学术单位的钱花不完，就轮番“出国考察”。据笔者所知，有的单位，在得到科研经费之后，只拿出其中一部分委托私人公司替他们做实验，甚至撰写论文，其余的全部私分。

显然，中国学术界的水平低下根本就不是由于缺钱。也许有人会说，从科技投入到科技

产出需要一定的时间，再等几年，中国的科技水平就会出现转机。这种说法如果不是一种托辞，就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第一，中国的科技投入从 1986 年起，也就是所谓的“863 计划”启动时起，就呈明显上升趋势。至今，这个计划已经持续了 18 年。即使是注重于基础科学研究的“973 计划”和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的实施，至今也都有六、七年的时间。但至今，除了杂交水稻项目之外，863 计划真正能够拿得出手的科技成果却极为罕见。(参见：赵利：《“863”成果览萃》)。而袁隆平的杂交稻技术，在七十年代就已经完成了基础工作。863 计划的主要内容是高技术的应用开发，一般研发周期很短，大约在三、五年时间，因为新技术的出现很快就会取代旧技术。在上世纪，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只用了三、四年的时间；美国登月的“阿波罗计划”只用了七、八年的时间；即使是人类基因组计划，也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实际可以更短)。而中国科学家在六十年代仅仅用了六年时间就完成了从“两弹”到“一星”的跨越。时至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科学家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搞出一些结果呢？

第二，从目前中国学术界的教育水平和研究水平来看，在今后几年内，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相对水平仍将处于下滑的势态，这是因为，造成目前这个状态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除了资金投入力度会加大之外，学术腐败规模将会变得越深越广，而教育质量和水准会变得越差越低。(冀文海：《中国高等教育持续滑坡，8 成大学生对高校教育不满》)。而大量的资金投入，对于腐败的中国学术界来说，就如同给一个身体虚弱的人服用“人参大补汤”一样，其后果必然是虚火上炎，纵欲过度，精竭髓枯。

第三，中国的本土科学家中，至今没有一个人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不仅如此，目前能够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的、中国自己培养的科学家也可以说是寥寥无几。这说明中国学术界在未来的十余年内的前景仍旧不容乐观。

四 学术水平低下的原因是学者个人素质太差

实际上，早在六、七十年前，毛泽东就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而在学术界，“人的因素第一”更应该是妇孺皆知的道理：决定学术水平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是人而不是钱。设想一下，一个没有创新本领的人，难道能够因为拥有了巨额金钱就突然间获得了创新的能力？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相反，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按照定义，都是那些能够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的人。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艾伦·麦克迪尔米德就针对中国的学术界说，“科学研究在于人，人是第一位的。”他还说，“据我所知，中国有相当多的资金”。(王勇：《科学研究在于人——艾伦·麦克迪尔·米德访谈录》)。那么，中国学术界人士为什么不到自身去找学术水平低下的原因呢？

事实是，无论是学术腐败也好，还是学术水平低下也好，它们所反映出的实质都是学术界人士的素质问题：没有搞学术的毅力，没有搞学术的能力，没有基本的道德修养，最后任凭自己的私欲恶性膨胀，于是发展成学术腐败。

(一) 一个学者应该具备什么素质？

1 素质的概念

就象“科学”这个概念并不存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一样，“素质”这个概念的来源也不是很清楚。根据《辞源》，素质一词的来源有三，一是指白色质地；一是指宝刀名；另一个是“犹本质”：“正静不争，动作不贰，素质不留，与地同极。”(《管子一势》)。显然，管子的“素质”概念并不是指人。根据《辞海》的定义，“素质”是“人或生物在某些

方面的本来特点和原有基础。”在《汉英词典》中，“素质”被翻译成“quality”。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素质”的相应英文是“constitution”。还有人把中文的素质与英文的“competency”和“literacy”相对应。而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 Smith)于1894年出版的著作《Chinese Characteristics》则被翻译为《中国人的素质》，因此中文的“素质”似乎还等于英文的“characteristics”。还有就是，在中国的大学，所谓“素质教育”又被称为“通识教育”，也就是美国的“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于是“素质”又变成了“general”。其实，上述英文词汇的意思相差甚远。无论如何，从中可以看出，西方文化中并没有完全与“素质”等同的概念。这是一个成色十足的中国土货。

尽管“素质”概念是个土货，但它的内涵却一点儿也不土。它的实际含义有两层：首先，它是生理学和心理学概念，即所谓的“遗传素质”；其次，它是教育学概念，是指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后天通过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所获得的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基本品质结构，包括人的思想、知识、身体、心理品质等”。(柳斌：《关于素质教育问题的思考》。转引自：陈永杰：《素质与知识》)。说得明白一点，“素质”就是指一个人的道德水准，知识结构，文化修养，以及各种不同的能力。目前中国社会流行的“素质”概念，基本上是在教育学意义上的。

一般来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如果教育系统臻于完善，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素质的高低主要受其所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而学者，由于所受的教育最多，因此应该是社会中素质最高的一个群体。但是，由于某种原因，目前的中国有个非常奇怪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学者群体的素质不仅不是社会各个阶层中最高的，相反，他们的一些素质参数要远远低于全社会的平均水平。而在很多情况下，在这个群体中，越是地位高的人，其相对素质就越差。

2 学者的定义

那么，学者是什么样的人呢？在《辞海》上，“学者”的定义有两条：①求学的人，做学问的人；②学术上有一定造诣的人。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认为，学者的个人使命就是追求真理，他的社会使命则包括教育同代人和后代，以及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因此，学者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他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何怀宏：《重温学者志业》)。美国哲学家、诗人爱默生(Ralph W. Emerson)在1837年所作的著名讲演《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中指出，社会上的各个行业实际是一个“全人”(One Man)的不同功能，而学者就是“思想之人”(Man Thinking)。Man Thinking 不同于 Thinker，后者是一个被动的、靠吸允他人的思想活着的人，而 Man Thinking 要形成自己的思想。“学者的职能就是通过展示事物的本质来激发人类的兴趣，提高人类的水准，指导人类的活动。”也就是说，学者的功能就是追求真理，揭示真理，领导人类走向未知的前方。

所以，学者是一群追求真理的人，他们是人类、是社会的头脑。但实际上，追求真理只是学者的功能，或者说是职责。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追求真理呢？换句话说，学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我们不妨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

3 孔子的学识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学者非孔子莫属。孔子说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可以说孔子从小就立志于学业，追求真理(道)，一生不渝。“朝闻道，夕死可矣”，是孔子追求真理的最好写照。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虽然他是当时中原各国学识最为渊博的人，但他并没有丝毫的傲气，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不耻下问”，肯向小孩请教，公开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即使是对自己的专业(儒，也就是礼仪方面的学问)问题，他遇到不懂的事情也敢公开请教，别人嘲笑他说，你不是知礼吗，怎么还什么都问呢？他则说，不懂就问，此正是礼也。

当然，光有学问是不够的。儒家讲究修、齐、治、平，因此修身立德就是一个人成为学

者，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的重要一步。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孔子还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这些思想后来被孟子发展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信条。强调道德为本，强调人格的高洁，可以说是中国学者的最显着特色：一个学者要“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孟子语）。

好学修德的目的是完善自身，而完善自身的目的则是要为社会服务。这是孔子精神的一大升华。“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一个学者的成长过程；“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是一个学者从自身做起，然后为他人服务，为社会服务的人生历程；“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是一个学者的处世原则。

孔子的学问是具体的，世俗的，他所关心的多是现实社会中的问题，他讲授给学生的也多是实用知识。他不谈“神鬼力怪”，也不擅长抽象思辨，终其一生，除了留下了一部语录体的《论语》之外，他的最大学术成就应该说是他整理了中国的古代典籍，编订《诗》《书》《易》《礼》《乐》《春秋》，由此形成了中国的经典文化体系的核心。司马迁说他“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孔子的成功之处不在于创新，而在于整旧：整旧一新。他之所以能够如此，最主要的素质是他的学识。从《诗》三百篇中，他能够总结出“思无邪”这个要旨。一部言简文约的《春秋》，却“微言大义”，成为定名分、制法度的规矩。有人说，一名学者需要有三方面的素质：才、学、识。才是先天的秉赋，学是后天的积累，而要有“识”，却极为不易：它是“才”和“学”的最为优化的组合。

4 屈原的胆识

如果说孔子是中国第一位“集大成”型学者的话，那么屈原就是中国第一位创新型学者。以他的作品为主要代表的《楚辞》，打破了《诗经》以来的四言格局，使用长短句式，为后世的五言、七言诗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屈原的代表作品《离骚》不仅是中国第一首长篇巨制，而且是第一首浪漫抒情长诗，第一首政治长诗，第一首理想长诗，并且建立了一个新的文体——“赋”。他的《九章》，开咏物诗、山水诗之先河。中国的诗歌艺术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化中最璀璨、最辉煌、最伟大的篇章，屈原的功绩当属第一。除此之外，屈原在《天问》中总共发出了一百七十多个疑问，问题所指，上至苍天，下至大地，远及隧古，近及当代，日月星辰，花草鸟兽，先贤往圣，风土人情，无所不包，无所不思，无所不疑，无所不问，可以说是中国学者的《独立宣言》。

屈原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学术成就”呢？这首先要归功于他对真善美的强烈热爱和不懈追求。在《离骚》中，他用香草美人先贤往圣象征美好的理想，对它们的追求，他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司马迁在评论屈原的《离骚》时说它“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必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列传》）。

屈原的第二个素质就是他的独立性。也就是这个独立性，使他敢于质天问地，敢于面鬼对神，敢于出生入死。他怀石自沉，并不是要为楚王殉葬，也不是为了生计无着，他是在为自己的理想、自己的人格而献身。“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他生前曾请太卜占卦：

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
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
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媮生乎？

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哱訾慄斯，啾啾嚅儿，以事妇人乎？
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絜楹乎？
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
宁与骐驎亢轭乎？将随駉马之迹乎？
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

显然，屈原并不需要谁的指点，他的心中早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屈原的第三个品质就是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和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和责任感。在《离骚》中，他“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在《哀郢》中，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质问苍天：“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在诗的结尾，他发出了这样的哀鸣：“曼余目以流观兮，冀一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至死不忘家乡，其情自可感天撼地。

可以说，屈原的上述三个品质，造就了他的特殊“文人气质”：对所爱，他炽热如火；对所恶，他视如仇讎。而这个气质的延伸就是屈原的非凡之胆：除了自己坚信的真理，他什么都敢于去怀疑。如果说成就孔子的素质是“学识”的话，那么成就屈原的素质就是他的“胆识”。也可以这么说：胆识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学者所不可或缺的素质。

5 蔡元培的人格

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学者有两个人，一是蔡元培，一是胡适。蔡元培生于1868年，比孔子晚两千四百多年，比屈原晚两千二百多年，但他却是中国第一位具有西方特色的学者。为什么这么说呢？

与中国的学者相比，西方学者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己的独立性：学术本身就是事业，就是职业，它不需要依附于政府或某种其它社会势力，它有自身的存在价值，它也能够独立地存在下去。由于从事的是独立的事业，所以西方学者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而中国的学术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短暂独立之后，两千年来几乎完全消失。即使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学术也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不论是政治学派如孔子的“仁政”，孟子的“王道”，墨子的“兼爱”，韩非子的“法术”，还是哲学学派如老庄，他们都以社会现实作为探讨的对象，而学者如果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必须依靠社会的力量。这就基本上决定了学术的独立性问题：实用学术必须“有用”才能够被接受，而被谁接受呢？不是学术界自己，而是现实社会。学术不能独立，学者当然也就难以独立。前面说屈原具有独立性，那是指他的个人而言，并且也以悲剧告终。实用学术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难以进入高深的、抽象的、形而上的境界。没有抽象的学问做基础，任何学术都是肤浅的。

虽然很难说蔡元培先生是最早意识到中西文化这个巨大差异的中国人，但他却是最早致力于消灭这一差异的中国人，并且可以说是唯一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就的人。他使与“太学”无异的北京大学变成了“研究高深学问”的现代化大学，他要求大学生“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尤当以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这些，可以说是深得西方文化之精髓。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又强调教育独立，学术独立，讲究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更是抓住了办学的关键。蔡元培先生后来创建中央研究院，基本因循这一套原则，为中国正统学术的建立打下了深深的基础。人称蔡元培先生是“中国现代教育之父”，他当之无愧。

蔡先生的成就有目共睹，功在千秋，当然不需要我来为他歌功颂德。我要探讨的问题是，作为学者，他怎么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呢？他有什么特殊的本领吗？有人把蔡先生的特殊本领总结为“正大的宗旨，博大的思想，伟大的人格”三条（袁瑜：《教育呼唤蔡元培》），我深以为然。

第一，蔡先生有坚定的信念。他坚信救国之道在于教育，而教育之道在于独立，指出“国家富强，恃乎人才，人才陶铸，端赖教育”，“自人文进化，国家之贫富强弱，与其国民素质之高低、学问之深浅成比例”。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

第二，蔡先生学贯中西。他是前清的进士，后来到德国和法国留学多年。这些经历，加上他不懈的思考和若谷的胸怀，最后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他的学生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觐。先生歿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第三，蔡先生有崇高的人格。蔡元培先生非常注重道德修养。他性情温和，雍容高雅，温良恭俭让五德兼备。他说，“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助其为恶，无益也。”早在辛亥革命之后，他就参与组织了“进德会”，要求会员不嫖不赌不当官。在给北大学生的第一次讲演中，他就告诫学生要“立志、立德、立言”。他在北大建立了“进德会”，自己也身体力行，堪称表率。对下，他谦恭有礼；对上，他自尊自重。他有权，但用权皆出自公心；他有势，但从来都是以理服人；他有才，但从不恃才傲物；他有高薪，但却生活俭朴。身居高位的蔡先生能够脱帽向门役行礼，能够为北大的校工办夜校，能够在天安门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都说明蔡先生的胸膛里装着一颗圣人般的心。有这样的人格做保障，蔡元培先生才能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令行禁止，完成改造北大这一今人永远也完成不了的伟业。“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是一贯瞧不起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对蔡元培的评价。

所以说，一名学者如果想要把“知”变成“行”，必须要用自己的“德”来作为保证，否则就会流于形式。换句话说，如果只靠信念和思想就能够办好一所大学的话，今天的北大理应比蔡先生时代的北大更好，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而蔡先生的信念已经成了国人的共识，蔡先生的思想在学术界也被喊得震天价响。但实际上，今天的北大不仅没有长进，反而可以说是倒退回到了“太学”时期的北大。为什么呢？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今天北大的领袖们没有蔡先生的人格魅力。蔡元培改革北大的最早举措，除了聘请新锐之外，就是拿恶势力开刀：解雇了率领学生逛妓院的教师；辞退了后台强硬但不学无术的英国教师；废除了学校教务会议讲英语的“常规”。把这些与北大今天专拣软豆腐下刀子的“癸未改革”比一比，高下优劣不就立刻水落石出了吗？

6 胡适的见识

在近代中国的学术界，胡适的名气比蔡元培要高、要响。谁不知道以首次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胡适？谁不知道“胡博士”在 26 岁就成为北京大学的教授？谁不知道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谁没有听说过他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治学名言？可是仔细一想，人们也许会发出疑问：盛名之下，难道就这些？

是的。胡适的学术贡献大致如此。他自己就说，“设若不是蔡先生，我胡某人还真不知道在哪家三流小报做编辑！”在他的那篇被誉为“文学革命第一枪”的《文学改良刍议》中，他只是怯生生地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也就是说，他只是提出在形式上“改良”文学，而“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倒是在《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一个月之后，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了“三大主义”，才把文学革命的性质和内容做出了明确的阐述。

胡适的学术领域包括文学、历史、哲学，据他自己说，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文学是他的娱乐。确实，奠定了胡适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的，是出版于 1919 年的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这本书是胡适根据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扩充而成的，而那部学位论文却没有能够使胡适在 1917 年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其实，这并不奇怪。这部著作基本上没有什么深刻的见解和重大发现，其长处在于“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蔡元培为这部书写的序言）。不仅如此。胡适一生著述总量超过两千万字，但却一直没有把这部著作的下半部续完，结果使它成了一部真正的“掐头去尾”的中国哲学史。

胡适的另一个学术特色就是非常注重做学问的方法，据说光这方面的著述就达百万字之

谱。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十字箴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但这并非他的首创，而是他在美国读书时从《大英百科全书》中偶然发现的。

尽管如此，胡适还可以被认为是上个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学者，也是最成功的学者。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曾经送给胡适一副对联：“天下文章，莫大胡适；一时贤士，皆出其门。”胡适的弟子唐德刚先生说：“胡适之先生是现代中国最了不起的大学者和思想家。他对我们这一代，乃至对今后若干代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唐德刚：《写在书前的译后感》）。李敖则说：胡适之是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他对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贡献是石破天惊的、不可磨灭的。（李敖：《播种者胡适》）。著名大陆学者李慎之先生甚至宣称：“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见李普：《悼李慎之——我们大家的公民教师》）。确实，胡适是“近代中国惟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唐德刚语）。

那么，排除外界的、偶然的原因，成就胡适作为学者的内在因素有哪些呢？最主要的，当然是他的见识。胡适的一个条幅就是，“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什么是“不疑处有疑”呢？那就是能见他人所不能见，有自己的见识。当年，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虽然也曾轰轰烈烈，但面对“旧文化”的铁壁铜墙，未免感到有些无处下手。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则为新文化运动找到了突破口，开辟了新战场，并且使它成为主战场。在那篇文章中，胡适明确指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点，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案，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其见识，真的是非同一般。

胡适知道中国历史资料庞杂，真伪难辨，于是独辟险径，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撇开没有真实史料的上古时代，单刀直入，从春秋时代开始讲起，结果成为一家之言。尽管这本书的长处西方世界根本就不值一提，但在当时的中国，颇有使人耳目一新的作用。他的学生顾颉刚说：“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

即使看似简单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也能够显示出胡适不同寻常的眼光。如果从根上深究，中国的学术和西方的学术有一个极大的差别，那就是，在中国，学者重师传而不是重实证，重感性而轻理性，重形象思维而轻逻辑推理。研究方法的不系统、不科学是阻碍中国学术发展的根本上原因之一。胡适一眼看到中国学术的病根，因此提出了这个口号，使它“成为本世纪中国最响亮的学术口号”（陈平原语）。

所以说，尽管胡适的成名有其偶然性，但假如胡某人没有自己的本事的话，蔡先生虽然能够让他当北大的教授，也绝没有能力把他扶为中国思想界的领袖。

总之，一名杰出的学者除了应该具备广博的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识”：学识、见识、胆识。没有这些素质的学者，实际就是一堆书虫。而要把自己的崇高理念亲自付诸实践，他还要具备高尚的人格。

7 科学家的素质

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几乎没有现代科学。即使是在整个二十世纪，对中国学术界发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也大都都是些人文学者。科学之于中国，是在它显示出能够产生巨大的物质财富（及提高国防实力）之后才受到充分重视的。中国至今没有产生影响如蔡元培、胡适那样的科学家。

科学的基础就是理性思维，而人类进行理性思维的动机就是要寻找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很大一部分就是对自然现象的困惑。很显然，在科学处于萌芽状态的古希腊，对自然现象的探讨并不一定能够带来象今天那样的物质财富。这也是科学研究的另一个属性：没有功利性，它是人类处于“自由”状态的纯粹的精神活动。

所以，一个科学家的基本素质就是要具有好奇心，这是他追求问题答案的原动力。第二，

他要具备进行理性思维的能力，这是他能够达到彼岸的唯一途径。第三，他要摆脱物质利益的束缚，因为物质因素的考虑能够破坏一个人的好奇心，并且使一个人拒绝理性。第四，科学是人类学术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一名科学家也必须具备一名学者所应该具备的人文素质：道德修养，文化知识，独立人格，以及自知，自尊，自律，自省，等等。

(二) 当代中国学者的个人素质

那么，如何评价当代中国学者的素质呢？应该说，面对着全面腐败的中国学术界，我们很难找到合乎标准的中国学者。其实，现在的中国学术界更象一个官场，权势、地位、金钱、交易所起的作用要远远超过真理或学术。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找到了评价中国学者素质的切入点：通过分析中国学术界头面人物的素质来概括中国学者的总体素质。

1 没有自知之明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2003 年底，中科院的一位副院长在为了祝贺中科院营养科学研究所的成立，向该所赠送了一首自己填写的《沁园春》。这个因为毛泽东的名著《雪》而在文革中尽人皆知的词牌，到了这位院士的手中，却被糟蹋得令人惨不忍睹：不仅有白字，而且有缺句，“最要命的问题是作者根本不懂平仄。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两个句读能连着读下来而不错平仄的。”（转烛：《居然敢叫“沁园春”》）。更为可怕的是，这首词通篇都流露出了作者的狂妄。（陈诗余：《陈竺院士〈沁园春〉赏析》）。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敢给属下题字的领导人很多，但敢给属下赋诗填词的却极为少见，而敢于把自己如此拙劣的作品赠给属下的更是闻所未闻。谁都知道，孔雀在开屏时，会本能地把自己的正面朝向观众，以展示自己最美丽的一面。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位被《自然》杂志披露将担任中国科技部长的院士却毫无顾忌、毫不羞怯地把自己最丑陋的一面亮了出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笔者曾就此事私下向一位颇有名望的老者请教。老者长吁了一口气，嘴中迸出四个字：素质太差！

2 不懂得自尊自重的北京大学校长

素质太差的并不只是这一个院士。2003 年，正值非典爆发，全国大学几乎全部“封校”。可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却在此时率领一个院士代表团到美国访问，要向美国人学习如何搞“科学道德建设”。结果，哈佛大学校长以他们来自 SARS 疫区为由而拒绝接见。（亦明：《是东施效颦，还是邯郸学步：评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被哈佛校长拒之门外》）。面对这桩百余年来中外交往史上罕见的丑闻，这位校长院士却能够面不改色地继续当他的校长。遥想当年，蔡元培先生曾经因为一个学生当面顶撞了自己而要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究其根源，无非是以为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伤害。可现在的北大校长，不仅自取其辱，还连带了国人，但辞职的念头好像从来没有在他的脑海中出现过。同是北大的校长，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不用请教老者，我自己就知道答案：素质太差！

3 丧失了羞耻感的院士

其实，不懂得利用辞职来捍卫自己的尊严、捍卫学术界的荣誉的校长、院士何止这一位。东南大学校长抄袭案铁证如山，可是面对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面对校友的指责和学生的批评，这位校长既不道歉，也不检讨，更不要提什么辞职了。同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洪涛院士，尽管在 2003 年的非典研究中犯下了那么低级的学术错误，尽管他已经年逾古稀，但辞职谢罪这个概念对他来说好像根本就不存在。还有。中国的双料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在五十年代积极支持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上马。这个工程在其后的四十多年间对黄河上游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张院士为了洗清自己的责任，在中央电视台上说，他曾经反对建造三门峡大坝。这些人的脸皮怎么能够厚到这个程度呢？素质太差！

4 缺乏常识的高教精英

上海戏剧学院前院长余秋雨是一位享誉整个华语世界的学者。这位“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在别人指出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犯下的上百个学术错误（其实很多是常识性错误）之后，不仅不向批评者表示感谢，向读者表示歉意，反倒摆出一付无

赖的嘴脸，拒不认错，并且用“旁敲侧击、隐射暗示”的卑鄙手法攻击批评者。(余秋雨：《被“咬”者的回答》；金文明：《我答余秋雨》)。早在两千多年的春秋时代，以学问大家闻名于世的孔子就敢于“不耻下问”。到了战国末年，贵为秦王“仲父”的吕不韦还曾把《吕氏春秋》公布于市，以一字千金的赏格来征求批评意见。余秋雨者，一介书生而已，尽管名满天下，但其“文笔不如秦牧十分之一，学问不如钱钟书百分之一，见识不如鲁迅千分之一”，怎么竟容不得别人的批评呢？这位曾经告诫中小學生“知识和技能不等于素质”的大师(余秋雨：《知识和技能不等于素质》)，好像并不知道名气和头衔也不等于素质。

5 人格畸形的流氓教授

有这些素质太差的领袖作榜样，中国学者的整体素质就可想而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朱大海能够在众多学生面前，一边用手指头抠鼻屎，一边大骂自己的研究生“你脑袋灌水了？”(biosys：《这就是我们的杰出青年科学家》)。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王永成，在被自己的学生“炒”了之后，竟然反告自己的学生是窃贼，并且毫无愧色地写了一篇“告全国人民书”，张贴在了网上。(姜澎：《不甘长作编外“雇员”上海九名博士生怒炒导师》)。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黄定宇因涉嫌强奸自己的学生而被捕，然后又以“顺奸”的名义被取保候审。“白天是教授，夜间是禽兽”，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而是堂堂正正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是怎么了？素质太差！

6 天良泯灭的“中国杰出青年”

不仅欺侮、坑害自己的学生和读者，中国的教授还要坑害自己的亲生骨肉。就在去年非典爆发之际，中国的学术界又冒出了一颗明星。这就是自诩为“干扰素之母”，并被评为2003年“中国十大杰出青年”、2003年度“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人物”的陈薇。这个女人，为了自己的前程，竟然胆大妄为到自己年仅四岁的孩子当试验品来验证自己的新药。(央视国际：《阻击SARS的女科学家——军事医学科学院博士陈薇》；佚名：《陈薇：在偶然中找寻必然》)。在欧美，这是犯罪行为，罪犯不仅要坐牢，最终还会丧失对自己孩子的监护权。可在中国，这位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教授、研究员反倒能够依靠这种犯罪行为飞黄腾达。一般来说，药物筛选的途径都要通过细胞学、病理学试验，然后在动物模型上检验毒性和疗效，最后才可以用人来做试验，并且一般要用成人为试验材料。按照中国的法律，一个药物在进入临床研究之前，必须要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在非典防治研究方面，世界上首例利用干扰素在灵长类动物上作试验的报告发表于2004年春天。(Haagmans et al., 2004)。而陈薇的实验室在既没有细胞学和动物试验结果、更没有国家批准的情况下，却直接利用幼童当实验室白鼠，其无知无畏可以说天下无双。陈薇事件所反映出的，不仅是她学术素质差，简直是连作为母亲的天性都不具备。

7 出卖色相的“美男”教授

与黄定宇偷偷摸摸玩女学生、最后落个身败名裂相比，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著名学者”葛红兵要幸运得多。他不仅没有在中国坐班房，反倒一会儿新加坡、一会儿英国剑桥地满世界跑。这位坚信“性比爱情要纯洁一百倍”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美男作家”，立志要做“卓越的情色写手”，他给自己的一本小说起了一个“既暧昧又有暗示意味的名字”——《沙床》。《沙床》暗示什么呢？“上床”！在这本“半自传体”的书中，他一面渲染一个年青的教授与几位学生的缠绵情爱，一面又对记者询问“你是不是真的与自己的学生上过床”嗲声嗲气地佯嗔：“你的问题太尖锐了吧？我拒绝回答。”怪不得朱大可骂他：“一个学者，不以思想和文学力量见人，却光着身子跑上大街，还做出害羞的样子捂住了‘脸蛋’（注意，不是捂住‘羞处’）……从女作家叫春到男学者叫春，叫春的主题一如既往，但叫春者的身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朱大可、拉拉：《木子美·葛红兵现象意味着什么？》)。

不捂“羞处”而捂着“脸蛋”叫春，正是这位著名学者的独特之处：靠这个一露、一捂、一叫，《沙床》在短短两个月内就卖出了10万余册，并且还要出繁体中文版和法文版。名

义上，这是他卖脸蛋子的所得，但实际上，这是卖“羞处”的价钱，只不过这位学者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羞处”，所以应该直截了当地称它为“生殖器”。也许是看到这本书叫座不叫好，葛教授在拍卖完了自己的脸蛋子和生殖器之后，还要继续叫卖。首先，他卖自己的才：“我的文笔比长相好。”（黄莺：《葛红兵：痛恨美男说法》）。其次，他卖自己的思：“在书中我对命运发出了追问，钱钟书有吗？他没有大超越的理想。”再其次，他卖自己的隐私：“我现在的工资是每月三万港元，等明年到了剑桥还会多”，“我的科幻小说卖得非常好，每个月都有几万元给我”，“在短短的四年时间，我就在上海买了两套房子”。最后，他卖自己的身份：“我为自己的教授和作家身份感到可耻”。（李冰：《葛红兵开口为〈沙床〉辩白》）。在把自己卖了个精光之后，他还卖自己的兄弟和老爸：“书中写到哥哥得了肝癌，事实上我的哥哥就正在受这种病的折磨。我父亲与我也都有肝的毛病。”对这位教授来说，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卖吗？没有。任何东西到了这位名教授的手中都能卖。怪不得中国的学者们一个个都拼老命要出名呢。有了名，管它是美名还是恶名，什么烂货就都能卖出个好价钱。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葛教授大概不知道，金钱和名气不仅能够显示一个人的财富和地位，它也能暴露出一个人的素质。这位“美男”教授在金钱和名气之下暴露出的，就是自己一脸洗不净的穷酸相和一副换不掉的贱骨头。

8 具有黑帮政客特点的中国新生代学者

葛红兵是 1998 年刚刚出炉的南京大学博士，他实际上属于中国“新生代”学者，虽然这一代学者中没有几个人有他那么“幸运”和敢于在公众面前把自己脱得如此光光。那么，普通的“新生代”学者都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因为这些人迟早是要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力的，了解他们，也就可以预测中国学术界的将来。

在中文互联网上，有一个论坛叫做“虹桥科技论坛”。“虹桥科技论坛”的核心人物有两个，一个是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博士，目前在美国的华盛顿州立大学作博士后(Research Associate)研究工作，对国内自称是“资深研究员”，笔名离乡客。另一位是复旦大学的医学博士，目前在复旦大学医学院任教，笔名柯华。离乡客曾因发表了多篇 SCI 论文而被手下吹捧为“南大高人”。但自从他的一个本科小师弟在不到两年间就发表了八篇 SCI 论文的消息传遍全国之后，这个“南大高人”和他的喽罗们就再也不提这个话茬了。

“虹桥科技论坛”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它具有中国新生代学者的一些非常典型的恶劣特性：

第一，“虹桥科技论坛”具有黑道性质。他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用网友们的话说就是“对自己的所谓虹桥成员是又吹又捧，对不同意见的新人是又贬又压，随时‘愤青’挂在嘴上，说这个词的恶毒劲远远超过方说‘弱智’。知识分子的文人相轻全在那体现出来了。”因此这个自诩为“全世界坛员水平最高的论坛”被网友们称为全世界“最霸道的论坛”。（见万维读者论坛-教育与学术 2003 年 7 月 3 日）。当然，光是霸道还算不上“黑道”。“虹桥科技论坛”的黑道性质表现在，这个论坛虽然是面对公众的，但实际上，操纵这个论坛的少数人还有他们自己的内部组织，内部章程，和内部论坛。因此，对重大问题，他们的操作程序是先由内部论坛统一口径，然后分别以个人身份在“虹桥科技论坛”上公开发表言论。对“外人”的不同意见，他们一般首先采用群起而攻之的手段，使对方知难而退。如果这一招不灵，他们就使出杀手锏——删贴。其结果就是造成了这样一种假象：他们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观点。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是要影响中国学术界的决策层。比如，他们关于北大人人事改革的言论，就被他们自己编辑整理之后，由他们的内线转贴到北大的未名站。

第二，“虹桥科技论坛”成员的政治手腕非常圆熟、高超、老到，使人们在惊叹之余，不禁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他们的本领是天生呢，还是来自师传？比如，“虹桥科技论坛”为了赶搭“科教兴国”的快车，就把自己的名称改为“虹桥科教论坛”。千万别小看这一字之差，它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政治权力阿谀奉承、胁肩谄媚、俯首贴耳、

摇尾乞怜的德性。再比如，离乡客与柯华在去年不知因为什么原因闹翻了，结果这位“南大高人”兵不血刃地把柯华赶出了所谓的“坛中央”。上面说的那些虹桥黑幕，就是柯华在被赶下台之后揭露的。还有就是，在这次政变之后不久，离乡客等人为了掩盖劣迹，搞了一个假选举，扶持了一个傀儡版主。不言而喻，这个版主要看以离乡客为核心的“坛中央”脸色行事。所有这些，都显示出这些人的心狠手辣和虚伪狡诈。用柯华的话说就是，“就算我说谎，也只是说谎，你一个说谎者+犹太不比我高尚到那里去。你越来越像某网络名人，查网友 IP，追查网友身份，干得都上瘾了。辱没佛祖！”“自己说谎都习以为常了，都记不得了，还在那里指责别人说谎。首先批评他拉帮结派的不是我，这次他如此 high 的动机，实际上就是触动了他的帮派体系。”（虹桥科教论坛 2003 年 8 月 7 日）。

第三，“虹桥科技论坛”的核心论题之一就是为国内的学术界大唱赞歌，反对别人批评中国的学术腐败。批评学术腐败的文章在那里可以说是被斩尽杀绝，而张贴这类文章，或赞同这类文章的网友，则一定要被他们骂个狗血喷头。虽然他们标榜自己不说脏话，但那是对自己人而言。对于异己，他们说的脏话足以使坊间里巷的泼妇脸红。比如，有一位笔名“野狐禅话”的恶棍，遇到谁提学术腐败，就一定破口大骂，并且在骂人时一定要拿对方父母的生殖器当靶子，而“坛中央”成员却在一旁袖手旁观看热闹，版主也不删他的贴。这些人为什么对学术腐败这么热爱呢？这是因为，腐败环境对他们来说，是生于斯长于斯，因此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并且，他们还要在那个环境下继续繁衍孳孽。清除学术腐败，就象是掘他们的祖坟，所以他们才要不遗余力地誓死捍卫。那个离乡客在评论我的一篇批评中国院士骗取钱财的文章时，就明目张胆地说，“关起门瓜分基金的时候，怎么红脸都可以。把矛盾和内斗弄到网上来，甚至借网络、媒体搞臭竞争对手，这就是超限战的干活了。”（虹桥科教论坛 2003 年 5 月 2 日）。这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在骗取国家资金的时候，大家都要闷着头骗，出现了矛盾，要内部解决，谁也不许把矛盾公布出来。否则，如果骗局被揭穿，那就谁都骗不成了。实际上，这个打着美国“资深研究员”招牌的离乡客，确实是要在国内学术界捞一杯羹，据说他正被中国科学院上海科技物理研究所推荐，角逐上海的一个什么“白玉兰科技人才基金”。（上海技物所：《中美科学家合作研究金属和半导体纳米线》）。

可以说，中国新生代学者的上述三个特点是中国学术界全面腐败所造成的结果，也是中国学术界将继续腐败下去的坚实社会基础。对这些人来说，搞学术只是手段，而利用这个手段来攫取钱权名利才是目的。可想而知，有朝一日这些人掌管了中国的学术界，中国的学术腐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总之，中国学者的素质问题远不止于上面的几个例子，也不仅仅限于道德和文化素质。实际上，中国学者的学术素质更要低下。这一点，看一看铺天盖地的抄袭剽窃之风就一目了然了：如果自己有什么东西，干吗要偷别人的呢？

（三）当代中国学术界的整体素质

中国政府施行“科教兴国”战略是在 1995 年。在这之后，中国学术界的两大系统，也就是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所属高等院校，开始了从中央政府那里抢夺金钱的竞争。先是中国科学院，在 1998 年初向中央提出了题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上面批示道：“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国 21 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这实际上就是所谓的“知识创新工程”的起点。

1998 年 5 月 4 日，江泽民在北京大学庆祝建校 100 周年的大会上宣布：“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紧接着，以陈至立为首的教育部决定在“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即 211 工程）中，重点支持部分高等学校创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这就是所谓的“985 工程”。（焦新：《“985”工程 向着世界一流大学挺进》）。

“知识创新工程”和“985 工程”都是中央政府投资上百亿元人民币的巨大工程。在正

常情况下，这样的工程理应该经过严密、认真的科学论证，甚至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授权。但实际上，这两个跨世纪的学术工程的上马却极不科学。下面，笔者就深入分析一下中国学术界的这两个跨世纪工程。

1 不伦不类的“知识创新工程”

从字面上看，“知识创新”这个概念非常含糊，甚至有些荒唐。在这里，“知识”和“创新”是什么关系呢？是要把知识创新，还是要利用知识搞创新？如果是前者的话，那就是学理不通。如果是后者，则又不符合汉语语法规范。知识可以增加，可以创造，但却不可以创新。其次，这个“创新”的涵义是什么？是指原创性的科学发现？还是指具有新意的技术发明？可以说，这两种“创新”不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层次上都是截然不同的，在英文中，前者叫做 *discovery*，后者叫做 *invention*。*Discovery* 是揭示自然界中已经存在的现象和规律，即“增加知识”或“创造知识”，而 *invention* 则是利用已有的知识来创造世界上不存在的事物。根据中科院的官方文件，“知识创新”这个概念的英文是“**Knowledge Innovation**”，而西方国家很少有人把这两个单词直接连接在一起的，即使有，也通常是指“**Knowledge-based Innovation**”（基于知识的创新）。所以说，“知识创新”应该是一个技术学概念，是指知识的应用，应该叫“技术创新”。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给这个项目起这么个不伦不类的名字呢？显然，这是为了迎合江总书记的那个批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国 21 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而一个国家的“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为了迎合“上意”，竟然不惜胡编乱造名词概念，可见他们的素质处在什么水平。

其次，“知识创新工程”不仅概念不清，而且名实不符。根据中国科学院的解释，“‘知识创新工程’的总目标是：到 2010 年前后，形成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规律的、具有支撑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效运行的国家知识创新系统及运行机制，建设一批国际知名的国家知识创新基地，培养和造就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科技人才，形成不断取得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科技成果的环境，为使我国知识创新实力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力争我国被《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科学论文总数的排名进入世界前 10 名、专利指标的国际竞争能力进入世界前 10 名、中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进入世界前 10 名做出贡献。”（李春芳：知识创新工程百问）。这里虽然没有说明“知识创新”的涵义到底是什么，但很显然，它包括了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实际上，“中科院在国家研究与开发机构基础研究经费中的份额已占到 96.7%。中科院基础研究经费的大幅增长主要是由于知识创新工程的实施。”（杨振寅等：《反思当今的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而根据前面的分析，基础研究显然不应该包含在“知识创新工程”之内的。所以，“知识创新工程”是中国科学院搞的“偷梁换柱”之计。

第三，根据《中国科学院章程》第六条，“中国科学院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发挥国家知识创新体系核心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科学院的作用就是搞“知识创新”，“知识创新”是它的本职工作。既然如此，它搞这么个“知识创新工程”就显得师出无名了。这就好像是说，国家开办科学院的目的就是要搞科学研究，而这个科学院却提出了一个“科学研究工程”一样那么荒唐可笑。难道中国的工人也应该搞一个“打工工程”、农民搞一个“打粮工程”、军人搞一个“打仗工程”不成？

其实，“知识创新工程”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向中央政府要钱，要一大笔钱。果然，仅仅是这个工程的三年试点期间，朱镕基总理就拨给中科院 50 亿元人民币。2001 年，中国科学院的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为 23.5 亿元，比上年增加近 50%。这笔钱，主要是通过这个“工程”得到的。（杨振寅等：《反思当今的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在“十五”期间，这个工程又为中科院钓到了 100 亿元人民币。2001 年，中科院的“科技人员”总数不到两万五千人，这相当于每人平均“创新”经费超过 40 万元人民币，而一些大人物手中控制的经费则是这个数字的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那么，六年之后，“知识创新工程”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2003年，《战略与管理》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评价中科院某所在“知识创新工程”中的体制改革情况。该文的作者是这样评价的：“A所没有触及科技体制的结构性矛盾，而沿用了官僚化、拖延难点、回避矛盾和敷衍搪塞的策略。……道德化甚至政治化的表达试图掩盖的是改革中必然的冲突，同时失去了科学家职业伦理重建的机遇。改革为了创新，而改革的方式恰恰是传统的、没有充分民主的、官僚化的、当权者利益第一的。由此引发的科研组织结构性错乱、人员行为失范、利益主体驱动、道德弱化、官僚强制，并不能带来美国式的科研组织，相反它承担较大的改革风险，所以会发生不断改革的现象。”（杨振寅等：《反思当今的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也就是说，“知识创新工程”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中国科学院越变越糟。

上面那个中科院“A所”并不是一个孤例。1994年，中科院开始实施所谓的“百人计划”，其内容是“到20世纪末从国内外吸引百名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可是，随着“知识创新工程”的实施，这个“百人计划”几乎变成了“千人计划”，目前入选人数已经超过八百人。中科院先是在1998年，也就是“知识创新工程”的试点阶段，把“百人计划”的规模扩大成“在3年内每年从国外引进100名杰出人才”。2001年，由于“知识创新工程”全面实施，这个计划再次调整，“自2001年至2005年，每年从国外引进100名、国内引进30名优秀人才”。（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简介》）。他们为什么要大批从国外引进“人才”呢？因为靠他们自身的力量，中国科学院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自己设定的三个“前十名”目标。引进人才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他们发SCI文章，好对这个工程有个交代。但是，就象中国的院士水平随着人数的增多而大幅度下降一样，“百人计划”也随着“扩招”很快就变了味，很多学术水平一般、但道德水平更低的海外人士，通过人际关系，成了中国科学院的“学术带头人”。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根本就没有履行“百人计划”中所规定的义务，但却霸占着大量的科研资源。这导致了2003年初“姚雪彪事件”的爆发。（李虎军：《“公开信”拔出萝卜带出泥 海外学者瞒天过海遭非议》）。

面对“百人计划”的彻底失败，中国科学院并不在乎。反正他们有花不完的钱，用不尽的时间，和层出不穷的花样，而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不，就在2004年，他们又推出了一个“爱因斯坦计划”：要培养“科技将帅人才”。（孙自法：《培养大师级科学家 中科院启动“爱因斯坦计划”》）。这就象武大郎在突然中了彩之后，宣布要在自己的炊饼铺培养世界一流饭店管理大师一样荒唐可笑。

总之，“知识创新工程”自始至终都反映出了中国科学院领导人的素质问题：知识素质、文化素质、道德素质、以及学术素质都低得到了惊人的程度。用荒谬的理由来争取政府拨款，这是中国学术界整体素质低下的最明显标志。而“百人计划”在“知识创新工程”中的变质又充分说明了学术腐败与学术水平之间的关系：就是因为中科院科研人员的学术水平太差，所以他们要花钱请“外人”给他们打工。实际上，我完全可以说，“知识创新工程”不仅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它反而使学术腐败愈演愈烈。“知识创新工程”的唯一创新之处就是，它把中国的学术腐败传播到了海外华人学术界。

2 莫明其妙的“985工程”

如果说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是不伦不类的话，那么教育部主持的“985工程”就实在是让人感到莫明其妙。“知识创新工程”的名称虽然荒谬，但在这个名称的下面还是有些内容的。更为难得的是，这个工程是由中国科学院自己主动提出来的，说明他们多少还是有些“创意”的。可“985工程”上马的唯一根据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一句话：“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准的一流大学。”于是乎，中国的“若干所”大学，就象是在昏睡中的老狗突然被人踢了一脚一样，迷迷登登地拔腿就开始了“向着世界一流”的迅跑。在跑了一段路之后，他们才发现，自己追赶的“世界一流大学”就如

同水中月，镜中花，看得见，但摸不着。也就是说，中国顶尖大学的校长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口出狂言：北大和清华先后宣布要在“985工程”实施后15—18年内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大学才能够称得上是“世界一流大学”呢？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在研究了“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之后，归纳出了九个基本特征。根据对一些“量化”指标进行对比分析，他们认为北大和清华目前在世界高校中的位置在200-300名之间，“预计到2025年左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有可能进入世界大学体系的前100名，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刘念才等：《我国名牌大学离世界一流有多远》）。

其实，进入“世界大学体系的前100名”到底能不能算得上是“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刘念才等人自己实际就把那些排在100名之前的大学分成了两类，一类是20所“世界顶尖大学”，其余80所才是“世界一流大学”。所以说，这个“世界一流大学”实际上应该叫做“世界二流大学”。即使按照刘念才等人的说法，100所学校算一个等级，北大和清华目前在上世界上也只是三流大学，他们凭什么能够在不到20年的时间超过目前在他们前面的100多所大学，进入前100名呢？这种情况的发生必须有两个前提：第一，别人止步不前，或者倒退；第二，自己比别人发展得快。显然，指望别人倒退不仅没有出息，而且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的大学想要进入一流，就必须自己有比别人发展得快的绝活儿。可实际上，中国的大学在这方面是一无所有。刘念才等人做出那个“预计”的主要依据就是，“国家对大学的直接投入和竞争性的基金投入将不断提高”。而金钱对大学发展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是非常不确定的，在中国，可以说它的坏处比好处要大得多。前面讨论到的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

上海交大的“一流大学”研究虽然幼稚，但其做学问的态度还算是认真的。如果与北大清华的校长和书记们拍胸脯打保票似的豪言壮语相比，还可以说有相当浓郁的学术气息。看看清华大学前校长王大中院士是如何打算把清华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要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科学研究中要正确处理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研究关系；师资队伍建设中处理好尖子人才与团队关系；以及学校管理体制上要贯彻民主集中制等等。总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正确处理共性与个性问题，那种完全照搬国外一流大学的指标与办学模式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合适的。”（左春明、周月红：《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向世界一流大学跨越》）。我曾评论说，“这哪是在办世界一流大学，倒象是在办中国一流党校。”（亦明：《超一流的梦想，不入流的作为：评清华大学计划在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完全照搬国外一流大学的指标”也许是愚昧，但“完全照搬国外一流大学的办学模式”怎么就行不通呢？有什么不合适呢？如果行不通，如何才能建成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呢？王院士难道没有发现其中逻辑的荒谬吗？所以，清华大学心中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标准完全是自制的，因此实际上是根本就没有标准。

与清华大学的“中国特色”相比，北京大学的“世界一流大学”标准具有明显的“乡土气息”，你甚至可以说它是土得掉渣。根据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世界一流大学”不过如此而已：“如果我们能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在国家集中的、高强度的支持下，采取正确的学科发展战略，把81个国家级重点学科中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推进到世界前沿，那就应基本实现了目标。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卡耐基·梅隆也好，芝加哥也好，普林斯顿也好，也不是什么学科都好，而都是有若干学科是居于世界一流的。……这就是我们的办学思想、办学理念的核心”。（闵维方：《在2003年北京大学校友工作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我不知道北京大学总共有多少个学科，也不知道闵书记所谓的“世界前沿”到底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是谁把卡耐基梅隆大学封为世界一流大学。但我知道，这样的“办学思想、办学理念”是庸俗的，愚蠢的。实际上，这样的“办学思想”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有“思

想”，这样的“办学理念”也根本就不是什么“理念”。(关于大学理念，下面有详细讨论)。

也许是对中国高教界“创建一流”的愚昧、混乱局面不满，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前校长、现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监杨福家先生在 2002 年提出了“不仅要有大楼、大师，更要有大爱”的说法。“大楼”、“大师”之说，早已有之，它们来自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的名言：“大学者，乃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而“大爱”之说，据称是杨院士的首创。那么，什么是“大爱”呢？“让人们拥有安心工作的环境，营造一个以人为本的氛围，这就是大爱”。为了具体说明“大爱”的含义，杨院士还举出了几个例子，其中之一是美国数学家纳什(John Nash)在五十年代就已经是“大师”级的学者了。后来他的精神出了毛病，但普林斯顿大学仍旧宽容地让他在那里生活了 30 年，给予他巨大的爱护。最后，纳什恢复了健康，并且获得了 1994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了超级大师。(邓琮琮：杨福家：《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有大楼大师，更要有大爱》)

杨院士的“大爱”说甫一问世，就受到了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极大关注。一时间，许多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都纷纷表态，要用“大爱”培养大师，通过培养大师建造世界一流大学。有人高兴地说，“如果有了大楼、大师、大爱，那么我们心仪已久的、‘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一流大学，也许就‘蓦然回首’，‘正在灯火阑珊处’了。”(陈鲁民：《教师节随想：大楼·大师·大爱》)。

建立一流大学有这么容易吗？这个从大爱到大师到一流大学的公式是可行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在一流大学集中的美国没有人总结出这条规律？为什么世界上还会有二流、三流大学，甚至四流、五流大学？实际上，在美国的高教界，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大爱”。美国大学终身教授目前所享受的优渥条件，是他们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争取来的。而对那些尚未得到终身教职的大学教师来说，他们面临的竞争是非常残酷激烈的，“不发表就灭亡”(publish or perish)是他们必须遵守的竞争规律。再者说，“大爱”说实际上是把大学教师放在了需要受学校行政当局眷顾的位置，这也与美国大学的治校原则不符。“大学教授就是大学本身”，这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莱比(I. I. Rabi)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的校长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更何况，即使是在美国学术界，能够成为大师的人终究是少数，而在学术水平如此低下的中国，国家要付出多少“大爱”才能够换来些许几个大师呢？退一万步说，仅仅是希冀自己的教师有朝一日可能成为大师而让他们“拥有安心工作的环境”，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大爱”，而恰恰是怀有极大私心的风险投资。古人云，“为善而欲自高胜人，施恩而欲要名结好，修业而欲惊世骇俗，植节而欲标异见奇，此皆是善念中戈矛，理路上荆棘，最易夹带，最难拔除者也。”(洪应明：《菜根谭》)。由此可见，杨院士的“大爱”说仍旧是在中国世俗文化的酱缸中打转。

事实是，普林斯顿大学根本就没有给纳什什么“大爱”。1964 年，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在纳什病情出现了转机、他并且开始重新开始研究工作之际，给了他一年的客座研究员(Research Mathematician)的位置。这里面，纳什的朋友从校园内外施加的影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迟至 1989 年，当瑞士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委员会派人与纳什面谈，要请他到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俱乐部坐坐时，纳什还问来人：“我能进去吗？我不是教授。”这使那位瑞士教授感到纳什在普林斯顿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1994 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委员会决定纳什为获奖人之一时，纳什的“悲惨人生”是重要考虑因素之一。在得到获奖的消息当天，纳什在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举行的小型庆祝会上说了三句话，其中两句是：他希望获得这个奖项能够使他的信用等级上升，从而得到信用卡；另外，一般获奖者应该说他很高兴能够与别人分享这份奖励，但他却想要独得这份奖金，因为他太需要钱了。(S. Nasar, *A Beautiful Mind: The Life of Mathematical Genius and Nobel Laureate John Nash*)。一个在“大爱”中生活的人难道能够这么悲惨吗？当然不会。实际上，纳什在获奖时连普林斯顿大学的正式教职都没有，只是一名“客座研究合作者”(Visiting Research Collaborator)。

从另一方面讲，中国高教界对“大爱”理论的热烈反响从侧面说明，目前国内高教界是如何的幼稚。那些未来“世界一流大学”的领导们对国外高等教育的发展根本就不了解，而对自己应该如何发展也根本没有明确的思路。尽管他们在媒体上可以说得天花乱坠，其实从根儿上讲，他们的中心思想，或者叫做“办学理念”，就是要国家多多地出钱。有了钱，他们可以盖大楼，可以聘名师，可以多发表SCI论文，然后学校就由“知名”到“著名”，最后就成为“世界一流”了。但是，让我们假设北大和清华可以有无限的资源，假设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师资全部换成哈佛大学的教授，那么，这样的北大清华就算是世界一流了吗？当然不会。因为只要目前官本位的高教体制、高教政策不变，只要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不变，只要虚伪狡诈的人文环境不变，只要大学校长继续拿着校长当官做，绝大多数有创造性的学者在中国的大学内都将会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这一点，任何头脑清醒的学者都应该明白，也不需要我来证明。

所以说，中国目前这个投资已经超过300亿元人民币的“985工程”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糊涂工程：甲方没有明确目标和指标，乙方没有明确资格和手段，双方都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事实是，中国的大学校长们根本就不知道到底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他们也根本不知道大学的功能是什么。

总之，中国学术界的两个跨世纪工程，“知识创新工程”和“985工程”，从上马到实施，都充分暴露了中国学术界骇人听闻的低素质：丧失人格地奉迎“上意”，恬不知耻地骗取钱财，不懂装懂地玩弄学问。这两个工程的实施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也就是提高整体学术水平，支持国家建设，相反，却消耗了国力，加重了学术腐败，不仅使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且使中国目前的学术水平与几十年前也无法相比。（黄俊伟：《说过去的教授和现在的教授》；冀文海：《中国高等教育持续滑坡，8成大学生对高校教育不满》；杨振寅等：《反思当今的中国科技体制改革》）。

（四）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学术界

在中国文学史上，《儒林外史》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它是中国第一部以讽刺知识分子（士）为主要题材的作品。在吴敬梓的笔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猥琐、扭曲的人格特性栩栩如生。谁不知道那个因为中了举人而发疯的范进呢？所以，可以把《儒林外史》看成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部挽歌。

二十世纪初，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就是具有西方文化知识和价值观念，其代表人物就是蔡元培和胡适。不过，正像钱钟书在《围城》中所说，“中国的利害，天下没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所以，中国除了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有点儿新气象之外，从此一代不如一代。我们对第二代知识分子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钱钟书《围城》的影响。那个对同事妻子垂涎三尺的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那个趁国难之机倒腾药品的训导长李梅亭，那个一张口就是“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的教育部特派员，那个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方鸿渐，以及那个敢把克莱登吹成美国“很认真严格的学校，虽然知道的人很少——普通学生不容易进”的历史系主任韩学愈，使人们对这些中西合璧的学者有了很深的认识。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知识分子虽然在很长的时间内处于挨整的位置，但学识渊博和清高自守却一直是社会对他们认定的形象。再加上中国的传统对“读书人”有本能的尊重和敬畏，“老九”在最臭的时候其实也还是满吃香的。看过电视剧《渴望》的人都一定会对女主人公撇下深爱自己的那个工人而爱上知识分子王沪生留有印象吧。而在“科学的春天”，一篇《哥德巴赫猜想》，更把知识分子塑造成了不食人间烟火、一心为着科学事业的圣人。

那么，到了世纪之交，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1999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劫的《丽娃河》。在这部以华东师范大学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中，作者全方位地描写了大学校园内的学者群体。由于该书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描写有很强的现实

背景，所以华东师大当局曾出面阻止学生购买此书。

在《丽娃河》中，中文系首席博士生导师袁逸儒是个全国闻名的学者，但实际上他一生的学术本钱就是在五、六十年代写的两篇文章。这个大儒，控制着中文系的学术大权，但却把自己的学生当成生存的饭票，不仅在政治运动中出卖学生，还在职称评定中拼命压制有学术造诣的学生龙在田，使他在讲师的位置上一坐就是十几年，而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在手中都先后成了教授和博导。用小说中的话说就是，“他用手中的职称跟他们把持的权力作了交易，从而在高校里稳坐钓鱼台，一面扮演德高望重的清流人物，一面从权力之河里钓取种种实惠和好处。至于学生在他眼里，也不过是一根根的筹码而已，他的名声有一半是因为你们这些在外面奋斗出了学术影响的学生才水涨船高的。”从年龄上来判断，袁逸儒应该是三闾大学时代毕业的学者。

有袁逸儒当靠山，那个挂着博导头衔的吴天云才能够在中文系当了十几年的系主任。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吴胖子先让自己垂涎的学生姜丽人留校并且变成了自己的儿媳妇，在姜丽人出走之后，扒灰未遂的他又和自己的研究生江瑛姘居。尽管自己一肚子男盗女娼，但这个吴胖子却千方百计地要利用男女关系问题把龙在田置于死地。在很大程度上，吴胖子是发迹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学者的代表。他们无学有术，专门以整人为业，而他们整治的对象就是那些学业比他们好的人。这是因为，学业上的不足，使他们对真正的学者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和憎恨。

被袁逸儒亲手选定的学术接班人是文革之后毕业的新人张超。这是一个靠老丈人起家，靠出卖龙在田的学问而成长起来的中国第四代学者。他可以在公开场合大谈连自己也搞不懂的什么“终极关怀”，也可以在私下里利用女学生的抄袭行为而要挟对方与自己上床。看看他唱的高调：“不要以为现在全都自由了，可以为所欲为了；不要以为现在争相下海了，可以不顾良心了；不要以为现在都在赚钱了，可以不要学问了；不要以为现在是后现代的时代了，可以不要规范了，不要道德纪律了，不要天伦王法了，从而可以无法无天了！不要以为不再有人会为了崇高的理想站出来说话。抬起你们的头颅，看看吧，理想主义的旗帜依然在高高飘扬，那是人的精神，精神的人。”可以说，张超之流不仅综合了第二代学者的伪善和第三代学者的狠毒，而且加上了自己的特色，那就是无耻。

张超的最得意弟子就是博士生卢强。这位有“伍学者”之称的“第五代学者的代表兼发言人”，可以说不论是学问还是道德都秉承了乃师的衣钵。他的特点就是“懂得对什么人说不，对什么人说是，最后对自己说不是。”所以，他敢于跳起来面对五十年代的学者大喊：“怎么能解构崇高呢？怎么能抛弃理想呢？当年的青春万岁到哪里去了？难道你们玩够了崇高和理想就可以把她们扔在一边了？你们可知道我们还没玩过呢，至少大家玩玩对不对？哪有像你们这么霸道的？”他也敢于“向导师抬起头来，十分坚定地表示：张先生，你放心吧，我会接班的，我肯定要接班，这是一定的。我不接谁接？我不说谁说？共产主义是大家的事，也是我卢强一个人的事！”也就是凭着这套本事，卢强尽管在读书期间因为猥亵女生被抓，毕业之后还是留了校，成了张超的当然继承人，并且没有几年就要问鼎系主任的宝座。毫无疑问，卢强之流定将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正统。

与这些当权得势的学者相比，在这所大学走背运的都是一些正直、有学问的知识分子。老一辈的施先生和章先生由于斗不过袁逸儒之流(或不屑于与他们斗)，选择了逃避、与世无争这条道路，以此换来了相对安静的晚年。尽管如此，在章先生去世的追悼会，吴胖子念悼词时还是忍不住笑出了声。由此可见，搞学问本身在中国的大学就是罪恶，不管你与他们是是否利害冲突。与老一辈相比，凯方、龙在田、陶乐天等人面临的是袁逸儒、吴胖子、张超、卢强这四代邪恶势力结成的神圣联盟。最后，凯方跳楼自杀，龙在田离校出走，陶乐天下海经商。中国的学术界至此完成了逆向淘汰的一个大循环。

值得指出的是，在《丽娃河》中，正反面形象大都是成对出现的：老一辈的施先生和章

先生与袁逸儒相对照，中青年一代的凯方、龙在田与张超相对照，而陶乐天与卢强相对照。恰恰是吴胖子及其身后的一大批人，如校党委书记贾利民、中文系党委书记陈若莲、辅导员毛善平（黑猫）、博导汪仁明、忻向苏，等等，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正面形象。为什么呢？用作者李劫的话说就是：“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过来的老家伙，没有一个好的。”

在《丽娃河》之后，中国的文艺市场上先后出现了《桃李》和《所谓教授》等正面批判中国学术界的长篇小说。《桃李》因为以北京大学为背景、并且得到北大教授孔庆东的青睐而名气大噪。《桃李》描写了一位身兼名教授名律师双重身份的人，他亦学亦商，风光无限，但最后被情人杀死。据说书中很多故事都有真实的背影。《所谓教授》的背景是西北某农业大学，那里的教授朝思暮想的就是女人、金钱、名望、地位。其中最著名的台词就是：“听说你们教授白天是教授，晚上是禽兽，不知对不对？”尽管对教授的辱骂已经到了极点，但据说这所农业大学的老师认为，“真实的大学校园某些方面比小说中描写的更黑”。不过，虽然《桃李》和《所谓教授》的影响比《丽娃河》要大得多，但他们的深度和艺术水平比《丽娃河》要逊色得多。可以说，《丽娃河》是目前对二十世纪末中国大学最深刻、最全面的记录。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它至今没有被搬上银幕和荧屏。

五 当代中国学者素质低下的原因

本文在上面要说明的问题有两点：第一，学术腐败的根源之一是中国学术界的整体学术水平低下；第二，中国整体学术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学者的素质低下。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学者的素质会如此低下呢？中国的媒体每每夸耀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为什么在科学领域，中国人会如此不堪？下面，笔者从历史与文化，政治与社会，及教育制度这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简单地探讨这个问题。

1 历史、文化因素

1964年，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这就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著名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 Puzzle）。为此，中山大学哲学系在八十年代还设立了一个“李约瑟专题研究基金”；上海《自然杂志》在九十年代还曾专门开设了一个“‘李约瑟难题’征答”专栏，鼓励探讨这个问题。时至今日，对这个“难题”的探讨仍旧是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范岱年：《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

其实，把李约瑟的这个问题吹捧为“李约瑟难题”，或是“震惊世界的难题”，实在是有些故弄玄虚。而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科技史学界还在围绕这个“难题”打转转，恰好暴露了中国科技不发达的部分原因：没有自己的思路和研究方向，只是满足于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跑。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在1935年就由中国学者吴景超提出，比李约瑟早了将近三十年。（谢泳：《“李约瑟问题”可能来源于吴景超》）。可是中国的学者却宁可把它叫做“李约瑟难题”，以显自己研究的学问有多么高深。这帮人，本来是在别人画就的牢狱中转圈子，却还要摆出一副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英勇姿态；本来是在仰人鼻息，拾人牙慧，却还要装作大义凛然的样子，真是可悲、可怜、可笑！

其实，“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中国人为什么离现代科学越来越远？”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找到很明确、很简单的答案。早在1920年，思想家梁启超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曾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致身心，西学应世事。”（梁启超：《劝学篇》）。他还认为，中国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中国人的“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观念，它导致人们对自然现象缺乏兴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什么是

“内学”呢？什么是“德成而上”呢？不过就是中国文化注重个人的内心修炼，要“存天理，灭人欲”，忽视对外界、对自然的探索。除此之外，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注重实用，这对没有直接用途的学术探讨只能是起抑制作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这个价值观念对待西方学术的明确表态。所以，尽管中国自洋务运动起就引进西学，但结果是仅学得西方学术的皮毛末技，“惟其只知实用不知科学真义……只知读他人之书，不知自己研究”（翁文灏语），根本就没有得到科学的真谛。这一现象，至今仍在继续。

实际上，不仅是李约瑟，也不仅是梁启超，西方有很多人对中国文化都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观察，并且从中总结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比如，十九世纪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博士(E. Faber, 1839-1899)就曾总结出儒家学说中的种种缺陷，其中很多与中国没有能够产生科学有关，如：儒学“没有区分人的灵魂与肉体。无论从肉体上还是生理上，都没有一个关于人的清楚的定义”；儒学“没有解释为什么有的人生来就是圣人，有的人却生来就是凡人”；“据称，人人都有到达道德完美所必需的才情和力量，却没解释与此断言相对立的事实”；“尽管不断强调诚信，但却从未被鼓励过说话诚实这一前提，事实也正相反”；“孔子体系的最终结论，如他自己所总结的那样，即崇尚贤人，例如人的神化”，等等。（花之安：《自西徂东》）。这其中指出的，恰恰是中国人喜欢下论断，但却不屑于用事实和逻辑来证明。实际上就是说，中国的文化中，缺乏理性和理性思维。

苏格兰传教士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 在 1899 年曾有这么一段论述：“凡是对‘西方’科学已经有某些知识的中国学者士绅都爱说，‘欧洲’物理学的电、光、热以及其他学科的全部真理都已包含在八卦之中了。可是当问到为什么他们和他们的同胞对这些真理一直是而且仍然是一无所知时，他们就说，他们必须先从西方书籍里学到这些，然后再查对《易经》，这时他们发现在二千多年以前孔子已经懂得所有这些了。这样表现出来的虚荣和傲慢是幼稚的。”（转引自：席泽宗：《李约瑟论〈周易〉对科学的影响》）。

确实，没有理性的傲慢实际就是无知和愚蠢。前面提到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就总结出来中国人的二十多个特性，其中几乎全部是负面的，如：面子要紧、漠视时间、漠视精确、天性误解、拐弯抹角、柔顺固执、心智混乱、麻木不仁、轻蔑外国人、缺乏公共精神、因循守旧、漠视舒适方便、遇事忍耐、知足常乐、缺乏同情、互相猜疑、言而无信，等等。明恩溥先生只有学士学位，但他的文笔，他的洞察力，他的见识，他的总结归纳能力，即使是中国今天的院士，也没有几个人能够望其项背。

实际上，即使是对东方文化了解不那么深的西方科学家也能够“感觉”到这个“李约瑟难题”和它的答案。早在这个“难题”提出之前的 1953 年，爱因斯坦就曾评论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来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转引自：沈铭贤：《李约瑟与爱因斯坦——“李约瑟难题”的两种不同的回答》）。

纵观西方历史，现代科学的诞生由五大动力来促成。第一，古希腊人的“爱知”精神和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和思考是现代科学的种子。第二，基督教与哲学在中世纪的合流产生了经院哲学，而后的精华就是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它直接促成了近代数学的诞生。应该说，经院哲学对科学的发展具有及其重大的影响，而这一点却很少被人认识到。实际上，奥地利的僧侣孟德尔能够根据自己的豌豆杂交实验结果推导出遗传学三大定律，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院哲学的思维训练。第三，在中世纪末期，经院哲学家罗杰·培根 (Roger Bacon) 主张通过观察和实验的方法来研究自然科学。这实际上使科学的发展站在了理性和实验的双腿之上。第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古希腊文化对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后者在中世纪反过来又影响欧洲文化，是现代科学诞生的最直接原因。现代科学发展的第五个动力就是，

欧洲人对基督教的信仰促使他们追求精神世界的满足，进而追求终极真理。这虽然听起来有些矛盾，但对于没有偏见的人来说，道理却是显而易见的。

反观中国历史，中国人“爱知”的种子刚刚在春秋战国时代萌发就被消灭了。而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在中国文化中几乎很少出现。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也发生过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但中国从来就没有认真地、虚心学习、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而是把它们统统改造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带有咸菜大酱味道的文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佛教在中国与儒、道合流，最终“三教合一”。“三教合一”表明中国人在信仰方面极不认真，这在世界各民族中是极为罕见的。明恩溥先生就说，把各种不同信仰机械地结合在一起，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违背了中国人天生有条有理的本能。第二个就是任何一种信仰都把人类的道德本质贬得极低。还有外国传教士这么形容中国人：“缺乏对不朽的渴望，缺乏对美好、伟大事物的由衷赞叹，缺乏对伟大、善良的人物的持久、毫不动摇的热爱，缺乏向往神圣、高尚事物的灵魂。”是的，一个民族没有对真善美的热爱和向往，即使有把人类社会的等级层次规定得尽善尽美的能力，但却不会花什么时间和精力去探索漫无边际的自然。

中国古代有所谓的四大科学，即天文、农学、中医、数学，它们在最初都含有现代科学的基本成分，但它们最终都没有发展成现代科学，或为现代科学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中国古代天文知识发达，但其主要成就领域限于天象观测、历法、及观测仪器的制造，除了“天圆地方”这样的猜测之外，很少有超出实际应用范围之外的探讨和研究。而与制造浑天仪的张衡几乎同时的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则以数学为核心，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天文学知识体系。不仅如此。中国的农学停留在常识的水平上，而中国的数学也仅仅是精于计算，它们都在知识上升为理论这一关键时刻停步不前。中医学本来具备一些科学的因素，并且是中国唯一系统化的知识，但它却与具有玄学性质的阴阳五行、天人相应学说结合，最终成为目前这个土不土洋不洋、自己说不清楚，别人搞不明白的集经验、知识、哲学为一体的浑沌知识系统。而与中医有许多相似之处的阿拉伯医学，却通过与西方科学合流，成了现代医学的基础。同样，中国的炼金术与道家学说结合，发展成迷信神仙的道教，而阿拉伯人的炼金术却最终发展成了化学。

另外，中国文化中还有一些曾经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美德的东西，但实际上它们是中国社会腐败的精神源泉。（刘清平：《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比如，儒家思想强调“首孝悌，次谨信”，这就把个人诚信这个品格放到了第二位。实际上，儒家的所谓“五常”，“仁义礼智信”，是分为两个等级的：其中前四项是“主德”，它们的实质就是孝悌；而“信”是名符其实地敬陪末座。所以，外国人非常容易地就能够发现“中国人不讲信用”这个特点。实际上，儒家孝悌观的实质就是强调血亲私德高过公众利益，这就造成了中国人极端的自私自利，缺乏公德。

在《论语》中，有这么一段对话：“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也就是说，父亲犯了法，儿子的义务不是检举揭发，不是出庭作证，而是要掩盖父亲的罪行。这就叫做“直”。

在《孟子》中，有这么一段对话：“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何之？’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何之？’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舜是儒家思想中的圣人，与尧号称“二帝”。舜出身贫寒，父不慈，母不爱，弟不悌。这就是所谓的“父顽、母嚚、象傲”。但舜在当上天子之后，他的父亲如果杀了人，舜应该怎么办呢？孟子认为，舜不能惩罚他的父亲，否则有违孝道，所以他就会放弃天下，背负老父逃到海滨，逃避法律的惩罚，“乐而忘天下”。这就是“窃负而逃”的典故。也就是说，因亲枉法，因私害公，

在儒家学说中是美德，而不是罪恶。

在《孟子》中，还有个“封之有庠”的故事。舜的弟弟象一直要害死舜。舜得到天下后，并没有处罚象，而是把有庠封给了他。万章于是问孟子：“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意思是，舜惩罚共工、驩兜、三苗、鲧是因为他们不仁。可象的不仁已经到了极点，舜怎么还封赏他？有庠的人民有什么罪吗？孟子则认为，舜的做法完全正确：“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孟子·万章上》）。也就是说，儒家文化认为，为了亲亲，可以坑害无辜；为了亲亲，可以假公济私。一人当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仅没有什么不对，而且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在如此荒谬、虚伪的道德观控制下，腐败是名正言顺的，而探讨真理则有大逆不道的嫌疑。科学难道能够在这种环境下诞生？当然是不可能的。

胡适曾说，东方文明是人力车文明，西方文明是摩托车文明。什么是人力车文明呢？那就是驾驭、奴役、坑害他人的文明，是把所有的聪明才智都花在与他人斗争上的文明。而摩托车文明则是利用聪明才智来探索、开发自然界，使它为人类造福。胡适还认为，新文化运动才是那害了两千年瘫痪病的中国固有文明的对症良药，是当前救国救民的唯一道路。（胡适：《口述自传——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这个观点，至今仍旧没有过时。

2 政治和社会因素

自古以来，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当官从政，也就是“学而优则仕”。其实，按照朱熹的解释，这个“优”并非优秀之优，而是优裕之优：在学习之余，还有时间和精力，就可以去当官。这看上去，好像孔子认为学者应该以学为主，从政为次。但实际上，中国的正统观点是，学习就是为了当官。所以说，在中国学者的血液中，一直流淌着对权力和名利的渴望，而对学问的探讨和钻研，倒是次要的。即使是一些官僚学者，他们研究的也多是“资治通鉴”之类的学问。

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专制传统，而那些天子、皇帝没有一个人是学者出身。所以，知识分子一直扮演着陪臣侍从的角色。即使在历朝历代的造反派中，知识分子也只能充当军师和谋士，所以中国的学者总是需要依附于某种势力。这也就是所谓的奴性。而奴才的特点就是只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来博得主子的欢心，但是从来就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这就决定了他们没有创造能力。

辛亥革命之后，尽管中国在形式上“共和”了，但实际上极权政治却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极权政治的必然后果就是腐败，因此一大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政治的旋涡之中。就连曾经宣布要“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入政界”的胡适，在五四运动之后也大谈、并且大搞“好人政治”，这导致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出任驻美国大使，并且在后来差点儿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学者出身的国家元首。所以，即使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学者，也摆脱不了自身命运的束缚：他们与政治的渊源太深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同类的另一点显着差异，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在西方，民主政治的正常运转，不需要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分心。

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最大一个转折点就是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政权，而共产党克敌制胜的法宝就是所谓的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知识分子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该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性质的。但伴随着政治斗争的发展，这些参政的知识分子也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在摧毁旧政权中的作用，他们在新政权中的居功自傲，很自然地使后者对他们产生了猜忌，这是导致后来反右运动的一条主要原因。而政治上的成功，使左翼知识分子品尝到了依靠政治势力

的甜头。他们于是开始利用政治手段排斥异己，并且把政治全面地引入了中国学术界。政治斗争进入中国学术界，就是由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两个左翼学者开的先例。

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了《斥反动文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给北大教授沈从文、朱光潜及著名作家萧干分别扣上“桃红色作家”、“蓝色文艺家”和“黑色作家”的帽子，并且说，“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黑色、桃红色的作家。这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文章的结尾，郭沫若振臂高呼：“凡是决心为人民服务，有正义感的朋友们，都请拿着你们的笔杆来参加这一阵线上的大反攻吧！”当时正是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共产党政权呼之欲出之际，而郭沫若早在1938年就被中共中央内定为文化界的领袖，其号召力自然非同一般。果然，1949年春北京解放之后不久，立即就有北大的学生把《斥反动文艺》全文抄录，张贴在校内，并且写出了“打倒沈从文”的标语。在此打击下，沈从文被永远地从高教界和文艺界开除了。

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实际上是新中国文字狱的奠基石。在此之后，中国在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在1953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在1954年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在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在1955年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而郭沫若本人在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出任第一任院长，可想而知，他曾经是多么卖力地贯彻“政治领导学术”之一方针的。

如果说郭沫若是利用“大批判”的手段把政治引入学术界的先驱的话，另一位左翼学者马寅初则可以说是利用“运动”这个形式使政治全面覆盖学术界的尖兵和向导。1951年，北大校长马寅初在北大发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被改造的对象不再是某个特定的学者，而是所有的知识分子。也许是要与郭沫若曾当众向毛泽东行九十度鞠躬大礼一争高低，马寅初曾代表北大“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亦明：《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五)：北大校史之竖刁自宫篇》]。真是争先恐后啊。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中国的学术界打击学术权威、反对业务挂帅、讲究又红又专的运动一波紧接一波，一浪高过一浪。这些运动的实质就是把一名学者的价值首先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然后根据他的政治价值确定他的学术价值及使用价值。而实际上，那些达到政治标准的人，极少具备一个真正学者所应该具备的素质。其结果就是：越是专心搞学术的人，越在学术界呆不下去；越是对学术不上心、而只想着升官发财的人，越是在学术界飞黄腾达。有人说：“‘反右’在大学里造成的最后结局是这样的：第一流人材出局之后，那个空白就由二流三流的人材填充了。最终占据大学位置的是那些政治上可靠，业务上也还说得过去的人。”（谢泳：《最好的出局》）。用我的话说就是，在反右运动中，“德才兼备的人被‘烹’掉了，剩下的不就是那些有德无才、有才无德、无才无德的人了吗？这么一来，中国学术界目前的学术水平低、腐败程度高的现象不就是顺理成章的结局了吗？”[亦明：《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六)：北大校史之易牙烹子篇》]。

经过反右和文革，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实际上成了徒具虚名的空壳，这是一群拥有些许专业知识，但是完全没有灵魂的生物，他们的价值就在于他们的空架子和那点儿知识。灵魂，不论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别人，根本就一钱不值。

实际上，在文革结束之后，虽然“左”的一套逐渐式微，但“右”的一套却日益猖獗，逆向淘汰的现象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变本加厉。所不同的是，淘汰的标准变了：政治标准变得越来越有弹性，而人际关系、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倒成了衡量一个学者的主要价值尺度。目前，中国学术界选聘人材的首要标准是这样的：你必须甘当决策者的附庸，甘心为他们个人服务，你还不能争取自己的独立人格。否则，你就别想进入学术界。这是因为，历史因素已经决定那些掌权者们搞不了学术，所以他们选聘人材的首要目的就是要给自己装潢门面，搞“政绩”，至于中国的科技是否真的发展，并不在他们的关心范围之内。本来，从八十年

代起，大批青年学者到西方求学，到科教兴国战略实施之时，正是他们学成回国之际。而根据科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文化的交流是促进学术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可中国的学术界却偏偏千方百计地阻止这些学者的回归。为什么呢？当然是怕手中的利益被抢走。（亦明：《中国学术界的海龟与土鳖之争》）。

所以说，中国学术界的领袖们的自身素质决定了中国学术界的总体素质。用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在 2003 年校友工作研讨会上的话说就是：在选聘人材时，他们是“武大郎开店——能人进不来”；在培养人材时，他们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在干工作时，他们是“武大郎放风筝——出手不高”；在搞学术时，他们是“武大郎卖豆腐——人松货软”；在吹嘘自己时，他们是“武大郎踩高跷——假充水平高”；在抢夺学术资源时，他们是“武大郎扛烟袋——冒充外国洋枪队”。（闵维方：在 2003 年校友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说得真是太形象了！不过，我还要再续续貂：这些人在对待下属的时候，是“武大郎扬脸抽烟袋锅——硬充老太爷”；在面对公众时，是“武大郎领潘金莲逛街——自鸣得意”；在外国同行面前，是“武大郎与西门庆对垒——相形见绌”。

这些武大郎搞学术的素质差，但在搞花样、搞腐败这方面却象是天才。在大跃进年代，北大中文系的一些师生仅用了 35 天就写出一部 78 万字的《中国文学史》，生物系的师生仅用 40 天就编出一本《河北省植物志》。清华大学也不甘示弱，在几个月内，编出近百部教材和专著，其中“学术泰斗”张光斗所在的水利系仅用了 10 天就完成了《水工概论》、《农田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测量》、《工程水文学》、《水工量测及模型试验》等“学术著作”。而武汉大学物理系则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要在几周内“建立世界一流的具有武大独特风格的新物理体系”。（张鸣：《曾经有过的高教大跃进》）。可想而知，目前中国学术界的领袖就是当年那些反右、大跃进的骨干。几十年之后，他们的政治本能和天才又在世纪末派上了用场。

所以说，学术腐败在九十年之后开始盛行的原因是这样的：九十年之前，尽管学术界是由二、三流的学者控制，但政治标准控制了他们的私欲，而国家对学术水平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再加上学术界是清水衙门，即使是想腐败，也没有门路。进入九十年代，学术界改由三、四流学者（也就是那些没有水平留学，没有勇气下海，又没有能力从政的学者）控制，但此时却什么标准都没有了，而“科教兴国”的金钱如同洪水般涌入学术界。此时学术界的当权派，又喜又惧，于是他们一手遮天，随心所欲，通过建立了那些科研经费分配“制度”，那些科研成果评估审核“制度”，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学位职称等级“制度”，把中国的学术界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一次又一次地上演欺骗人民和政府的丑剧。而那些所谓的“制度”，也正是吴瑞先生在那篇《自然·中国之声》文章中总结出的中国科技落后的部分原因。（吴瑞：《提高中国科学研究的产出率面临挑战》）。

3 教育因素

实际上，说一个国家的学者素质低，就象是说一个英雄胆子小一样，是有些矛盾的。这些学者不是博士吗？不是教授吗？不是院士吗？他们不是中国受到了最充分的教育的人吗？他们不是中国社会最有知识的人吗？他们怎么会素质低呢？是的，这些博士、教授、院士确实是受到了最充分的教育。他们也确实是中国社会最有知识的人。但所有这些都恰恰是造成他们素质低下的最主要原因。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是中国的愚昧教育造就了这些畸形的学者。

一般来说，教育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实用目的，也就是教育能够使受教育者满足自己的本能需求，如经济需求（就业、创业等），社交需求，消遣休闲需求，等等。教育的第二个目的是理论教育，它使受教育者产生与未知世界相处的能力。除此之外，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也有各自独特的教育目的。比如古希腊斯巴达人的教育目的就是要培养身强体健的武士，古罗马的教育目的就是要培养参与国家事务的公民，等等。而中国的古代

教育的目的更为明确，就是要保留过去，维持现状，制造单一。这个目的通过科举考试得以实现。其结果就是，这种教育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使受教育者的记忆力和模仿力得到了极好的训练，但却使他们丧失了主动性(originality)、创造性(creativity)、适应性(adaptability)、和发明能力(inventiveness)。

(1) 愚昧的知识教育

根据心理学研究，一个人的创造力首先来自好奇心，也就是发现问题，然后是对所发现问题进行思考，寻找解答。有些问题能够通过纯思辨得到答案，而有些问题则要通过观察和试验。没有发现问题的能力，不会独立思考，不懂得应用正确的研究方法，一个人就不会有创造力。关于创造力的原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因此，教育的最高境界是开启一个人的智慧之门，使受教育者获得创造能力。

可是，中国的教育恰恰相反。从小学，甚至从学龄前儿童开始，一直到大学和研究生院，中国的教育都在一个地点内进行，那就是课堂；都学习一样的内容，也就是知识；都用一个方式来教授，那就是老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都用一根棍棒来驱使学生学习，那就是考试。在棍棒的压力下，老师机械地教，学生被动地学。学习本身成了负担，分数成了学习的目的。在生存的压力下，学习又成了生存的手段。在这样的教育体制和教育环境下，中国的学生很难对自然现象产生好奇心，而教育本身使他们几乎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样的教育制度、教育体系是残忍黑暗的，是愚昧落后的，更是丧失天良、摧残人性的，

以灌输知识，而不是以开启学生的心智为主要教学内容，是中国教育愚昧落后的最显著标志。而这个教育体系最信奉的是这样一个口号：“知识就是力量！”这个口号是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那时的欧洲刚刚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苏醒，知识，包括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极度贫乏，所以这个观点在当时是正确的。即使是现在，基础知识的重要性也无可否认。但过分强调知识、甚至把传授知识当成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却是大谬不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逐渐进入信息时代，知识爆炸，信息量以几何级数增长，穷一个人的一生，也不可能学得某一领域知识之万一。“知识就是力量”在今天已经完全不再适用。对高级科技人才来讲，他们的“力量”在于如何寻找并且利用已有的知识来解决面临的问题，创造新的知识，创造更多的财富。换句话说就是，利用知识的能力比掌握知识本身更为重要。

过度灌输知识的弊端很多，但最可怕的后果是使学生的好奇心丧失，能力衰退。这里所说的能力包括自学能力，交往能力，动手能力，写作能力，思维能力，与人合作的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判断能力，组织能力，甚至想象能力！试想一下，一个有着装满了知识的大脑的人，却没有上述能力，他的用处何在？

(2) 浅薄的技能教育

实际上，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每个民族，每个社会，在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教育目的。在古代中国，教育的目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在古希腊的雅典，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具有健全的体魄、高尚的道德、发达的智力，和谐的美感的自由人。实际上，这两种目的也是世界各国在其后两千多年中依循的主要思路：或者强调教育为社会服务，或者强调教育为个人的发展服务。

那么，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早在一百多年前，美国高教界就开展了高等教育教育目的的讨论。是为了给学生以谋生的技能？还是让学生全面发展，成长为一个身心健康、兴趣多样、有自己独立人格的人？技能教育培养出的是工程师，农艺师，医生，律师，而全人教育培养出来的则是具有向各个方向发展潜能的“领导者”。考虑到社会的多样性和层次性，这两条教育路线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所以，在美国的剑桥市，既有世界上最好的培养领导者的摇篮，哈佛大学，也有世界上最好的技术专家训练场所，麻省理工学院。实际上，在美国，

职业教育(医、法、商)基本上是研究生教育,也就是建立在本科教育之上的教育。这就综合了全人教育和专业教育的优点,当然也增加了受教育者的负担。哈佛大学在一个世纪前曾要把工科教育也变成研究生教育,但最后没有成功。

反观中国的大学,他们基本不知道自己的教育目的到底是什么,对此也根本就不关心。相反,对于成名、对于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他们倒无比热衷。根据199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实际是在说,中国的高等教育以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为主。可实际上,中国的大学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比如,北京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就象是他们的母校一样,在这个世界上,茫然若失,手足无措。用一位北大毕业生的话来形容,他自己和99%的同学都是“废物”,“不仅丢掉了人文精神,而且生计也成问题。”(赵玥:《北大精英自嘲“废物”:名校不能承受之重》)。

(3) 虚伪的道德教育

实际上,中国教育的失败并不仅仅在于阻塞了青少年的心智和灵性,泯灭了他们的求知热情,摧毁了他们的创造能力,并且没有为他们提供维持生存的手段,而更在于它在学生的心灵中树立了虚伪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也就是说,中国的教育体系不仅造就出了大批高分低能的学者,而且培养出了为数不少的伪君子,并且扶植他们成了学术界的领袖。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建立道德价值观念,使受教育者成为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人。从西周开始,学校教育中德育(礼教)就居“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首。当时有“三德”、“三行”之说:“至德以为道本;敏德以为行本;孝德以知逆恶”;“孝行以亲父母;友行以尊贤良;顺行以事师长。”这个传统,被儒家总结成“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教育目的。孔子主张“教民以德”,“为政以德”,所以中华文化之本就是以德立国。中华民国建立后,由蔡元培主持制定的教育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其实质还是要以德育为主。新中国建立后,国主毛泽东亲自制订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当然,重视道德教育并不仅仅是中国的特色。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就是美德。而一个人只要知道什么是善良的,什么是正确的,就一定会去实践它。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1776-1841)认为,人类道德是由五种永恒的观念为基础的,它们是:内在自由、完美、善意、法律、正义。而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受教育者能够根据这些观念来调节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也就是成为具有“完美德性”的人。显然,赫尔巴特所谓的“完美德性”与儒家的“至善”是有区别的,而这个区别的关键就是把对法律的尊重、对正义的信仰纳入了道德体系。

其实,东西方道德观的差异不止于此。儒家主张的道德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己德、私德、公德。己德是所谓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私德是所谓的忠君孝亲,兄友弟恭,而公德则是有些空洞的“仁者爱人”。前面提到,儒家的道德观具有其虚伪性。这表现在,第一,它不仅允许,而且鼓励一个人因私废公,徇情枉法。亲人犯法,要隐瞒、包庇、宽恕;自己掌权,要提携、照顾、偏向亲人。其次,中国的传统道德把诚信的价值放在孝悌之后,结果导致中国人具有这样的信念:撒谎、欺骗是可以接受的,不说谎话干不成大事。第三,中国的价值观更注重形式,而轻视内容。所以,一个人可以说一套,做一套。五十年代,毛泽东先是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不久就把它改成“引蛇出洞”,并且公开承认这是在搞“阳谋”。一个国家的元首都公开搞这个言行不一的把戏,就更不要提其它的升斗小民了。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中,引用一位名叫基德教授的话说,“如果选择这个美德作为一种民族特质,不仅是为了在实践上蔑视它,而且也为了与现存的处世方式形成一种对比,那么,就没有比‘信’更合适的了。中国人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表现,与诚信

如此背离，因而他们的敌人会抓住这一点，来讽刺他们的表里不一。虚情假意、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和奴颜婢膝，才是突出的民族特点。”

目前，中国学校中的道德教育完全是在继承这个虚伪的传统。在学校中，“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主要指学生守则教育，学校常规纪律训练，遵守社会公德和文明行为习惯的培养，以及养成青少年谦虚、谨慎、诚实、正直、勇敢、勤劳、俭朴等优良品质。”但在实际中，学生们崇尚的价值观无不与上述价值观相对立。比如，人们一面口头上尊重勤奋，但实际上对“聪明”更崇拜，对耍小聪明的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钦羨不已。现在的学生不仅不认为考试抄袭有什么不对，反而认为它是时尚。学生干部本应该是由那些“德智体”三好的学生来担任，但实际上，中国大学的学生会干部多数是一些以投机钻营、升官发财、谋取个人私利为求学目的的人，但在口头上，他们的调子唱得比谁都高。所以，在这个系统中培养出来的人，其道德素质的低下就是正常的了。而他们在成仙得道，当上院士之后，还要大张旗鼓、恬不知耻地到别的国家去学习“道德建设”，更是顺理成章的——他们本来就没有基本的道德观。

道德教育的失败是中国学者素质低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虚伪盛行的环境下，追求真理几乎成为不可能的。

六 中国学术界的出路何在？

综上所述，中国的学术界目前实际是面临三大问题：全面深入的学术腐败；不可思议的整体学术水平低下；骇人听闻的学者个人素质低下。而本文的前半部分还证明，这三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学者个人素质低下导致学术界的整体学术水平低下，学术界整体水平低下导致学术腐败。那么，人们很自然地要问：中国的学术界还有救吗？

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目前的学术界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自成体系的系统。它既不对政府负责，也不对社会和人民负责。更重要的是，它对自己也不负任何责任。因此，对它们的当权派来说，学术界的学术水平是高还是低，学术腐败是深还是浅，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这些人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能够从政府那里连续不断地搞到大钱。这就象是一个重病在身并且染有毒瘾的人，他唯一关心的就是如何搞到毒品，能够连续不断地过瘾。所以说，靠学术界自身，它根本就没有救。

不过，社会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阶层，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子系统，都应该受到这个社会其它阶层、团体和系统的监督和制约。即使从法理上讲，中国的整个学术界都是政府部门，因此都应该受到政府的管辖。目前政府对学术界的放任，特别是对自然科学界的放任，其部分原因很可能是出于对文革前二十余年干涉过多的忏悔和矫枉，但更多的可能是对它们的依赖和希望。一旦这个梦幻般的希望破灭，依赖感也就会消失。而中国学术界对整个中国社会的腐蚀、破坏，也定会激起天怒人怨。所以说，尽管中国学术界忌病讳医，但最终，决定权不在他们手中，他们必须接受强迫治疗。

问题是，不论谁来治理目前的中国学术界，他们都面临着举世罕见的疑难病症。不仅疑难，而且它已经到了晚期，进入了垂死的阶段。想要妙手回春，几乎是不可能的。有鉴于此，笔者试着开出三个治疗方案，分别为下策、中策、和上策。下策针对学术腐败，它的目的就是要割除这个癌肿，使中国的学术界不至于腐烂到灭亡；中策针对学术水平低下，它的目的就是要中国的学术界能够自食其力，甚至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上策针对学者素质低下，它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的学术界达到与中华民族的世界地位相应的水平。

(一) 斩草除根，擒贼擒王：铲除腐败之源——院士制度

在《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一文中,我曾把中国的学术腐败定义为“学术界的系统腐败”,它包括三个层面:个人的学术行为腐败;团体的学术权力腐败;整个系统的学术原则腐败。按其发展方向来分析,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个人靠腐败行为攫取了学术权力,然后利用这个权力来保护腐败和扩大腐败,最后腐败现象蔓延到整个学术界。因此,学术权力的腐败是学术腐败的核心,如果想要消除学术腐败,必须拿学术权力来开刀。

什么是学术权力呢?学术权力包括有形的行政权力和无形的影响力。目前,在中国学术界掌握学术权力的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拥有法定“最高学术权威”头衔的院士们;一种是占据学术界各个部门领导职位的中学校长、科学院院长、研究所所长们。他们运用学术权力的实质就是实行对自己有利的资源再分配,也就是掠夺、瓜分学术和社会资源。(亦明:《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

如果在中国的学术界随便找一个人问:“在中国的学术界谁的权力最大?”绝大多数人都会回答说是院士。确实,说院士在控制中国的学术界一点儿也不过分。看一看中国科技部的正副部长们,看一看中国科学院的正副院长们,再看一看中国名牌大学的校长们,以及中国学术界的那几个“泰斗”,没有几个人没有院士头衔。即使是那些没有正式官衔的院士,在各自的工作单位都被尊崇得象太上皇似的。所以说,院士们实际上是集有形和无形权力于一身的。

中国的院士制度开始于1948年,当时中央研究院仿效欧美各国先例,评选出了中国第一批81名院士。新中国建立后,院士制度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第一次就是中国科学院在1955年建立学部,遴选出了233名学部委员。第二次就是在1993年学部委员改称院士,并且建立了中国工程院,从此中国的院士人数开始大幅度窜升,而院士评选也日趋激烈,被媒体喻为“选战”。目前,中国有两院院士一千四百余人。

细心人可能已经注意到,院士人数的爆炸和学术腐败的大规模爆发几乎是前后脚发生的。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的院士制度是学术腐败之源。我这么说的理由如下。

1 中国目前的院士是腐败制度的产物

在《中国院士制度的演变》一文中,我曾指出,从中华民国的院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学部委员的转变过程中,发生了四个明显的变化,它们为目前的学术腐败种下了祸根。这四个变化中的第一个就是,“学部委员”不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而是经过内部提名、内部评定、最后报请中共中央批准这么几道程序。因此它既不是民主选举,也不是学术评选,而是政治加学术的遴选。学部委员的遴选制度抛弃了中国第一届院士评选时建立的规矩,也不同于西方各国院士选举通例,倒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察举”制度极为相似。

“察举”是汉代设立的挑选官员的制度,一般是由地方官员或士绅向中央政府举荐有道德和才能的人,充当官吏。当时被推荐的人才有孝廉、秀才、贤良、文学、方正等名目。应该说,“察举”制度在建立之初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同时为出身贫寒的士人开辟了一条进入高层社会的门路。但是,慢慢地,“察举”制度趋于腐败,到东汉时,由于宦官、外戚专权,士人的这条晋升门路几乎被完全堵死,当时民谣云,“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察举”的腐败酿成“党锢之祸”,并且间接导致东汉灭亡。

到了魏晋时期,“察举”制度演变成了所谓的“九品中正制”,也就是由官员担任的“中正”根据家世、道德和才能这三条标准来臧否众人,将他们分成九种不等的“品”。由于在三条标准中,“家世”的份量越来越重,到西晋时,“九品中正制”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当时诗人左思写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躐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可见当时“察举”的腐败和黑暗。到了隋唐时期,“察举”制度被科举制度取代。

可以说，当年的学部委员遴选制度，实际就是中国一、两千年前“察举”和“九品中正制”在借尸还魂，是腐朽、腐败的封建制度的翻版，只不过政治标准替代了古代的“道德”标准。时至今日，遴选虽然在表面上变成了选举，院士选举的政治标准日渐松弛，但这个标准却有被“家世”标准取代的趋势。谁能被选上，看的不是他的学术水平，而是看“单位实力、推荐力度、本人背景——比如哪个学校毕业的、学部里校友和同事多不多、竞争者的实力强不强。”（时捷：《两院院士选举争论不断 选举为何退化成“选战”》）。实际上，目前的院士选举是半公开的贿选，其腐败程度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察举”和“科举”都要严重。

2 中国的院士制度腐蚀了学术界本身，败坏了学术界的风气

从 1948 年第一届 81 名院士到 1955 年第一届 233 名学部委员，中国的院士人数增加了近两倍，但在第一届学部委员中，仅有 1948 年的老院士 46 人。也就是说，第一届学部委员中，80% 以上在 7 年前没有资格成为院士。这个数字本身就可以说明，学部委员的学术水平在大幅度地下降。院士人数的另一次大爆炸发生在世纪之交。从 1990 年到 2001 年短短的 11 年间，中国的院士总人数从 400 人猛增了两倍多，达到 1269 人。这些院士的水平是那么低，以至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都不敢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他们的学术论文清单，而只是罗列他们的自吹自擂。不能够保持学术上的高标准，实际就是容忍低劣。这是中国院士制度对学术界的最大破坏。

院士制度不仅降低了中国学术界的学术标准，而且降低了道德标准。目前，中国院士中靠掠夺手段、靠欺骗手段、靠其它不正当手段获得院士称号的大有人在，有案可稽、并且世人皆知的就有山东大学蒋民华院士，中国科学院洪国藩院士，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贺福初院士。而那些在得到院士称号之后大搞学术腐败的可以说比比皆是。但中国科学院从来就没有因为“学术不端行为”惩罚处分任何人，反倒替自己的无耻行径百般遮掩，数次派代表团到欧美国家学习“科学道德建设”。这实际上是在承认中国的院士没有科学道德。

中国院士制度在 1955 年发生的另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学部委员的产生，必须要首先在政治上合乎标准。这就使当选的学部委员成为政治势力的附庸。而在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从反右到文革这段时间，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顶戴花翎，就必须以卖身投靠、出卖良心为代价。

早在半个世纪前的大跃进时代，学部委员钱学森就为了迎合“上意”，利用物理学方法证明亩产万斤的可能性。当时，尽管这样明目张胆地出卖科学良心的学部委员尚属少数，但绝大多数，也可以说是全部学部委员，却都昧着良心对这个违背科学的行为默不做声。

进入 21 世纪，中国的院士已经不再满足于以这种帮闲的身份来捞取好处或者自保，他们要亲自、主动地参与。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强伯勤为国外的骗子捧场，被聘为骗子所公司的首席科学顾问。还有的院士昧着良心，哄骗中国人民掏钱购买百无一用的核酸营养品。实际上，在学术界的所有角落，人们都可以发现腐败院士的身影。抄袭剽窃，弄虚作假，招摇撞骗，不一而足。详见笔者“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系列文章：（一）：丧失了社会良心的院士；（二）：欺世盗名的院士；（三）：蒙骗政府、愚弄人民的院士。

降低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和道德标准，靠出卖学术良心来换取个人好处，并不是院士制度对中国学术界危害的全部。实际上，中国目前学术界官气浓厚，霸气嚣张，匪气十足，无不与院士有关。一些学术水平极低的人在当上院士之后，有了国家授予的“副部长”级别，有了国家认定的“中国最高”权威，于是不由自主地就成了学霸。学霸都干些什么呢？巧取豪夺他人研究成果，霸占鲸吞国家科技资源，拐骗敛取社会财富。这些学霸在掠夺科研基金时是这么为自己辩护的：如果我不抢，这些钱也会被其他人抢走浪费掉，所以还不如给我。由于院士成了有权有势的捞钱能手，所以目前在中国社会刮起了院士热潮。如果自己单位没有院士，就花高价请外面的。因此，现在几乎每个院士都在好几个单位挂名兼差，美其名曰“兼职”，实际就是拿干饷，分干股，不劳而获。

对于院士兼职这个问题，中国科学院科学道德委员会主任许智宏院士告诫说，“一个院士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是可能的，一天干两份工作也是可能的，但更多就不好说了”。(李健、张东操：《署名剽窃兼职过多 让院士和学术以外的东西脱钩》)。许院士的话可以这么理解：一个院士领两份薪水还是可以的，再多，我们就有些不好交代了。请问许院士，中国的上千名院士，平均年龄在六十岁以上，他们之中有谁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呢？那些七老八十的院士中，又有几个人每天能够坐满八小时呢？这不就是施蕴渝院士的“405天等于18个月”理论的翻版吗？[亦明：《流氓教授与骗子学生(三)》]。

3 中国的院士制度不同于西方的院士制度

在《从 SARS 研究看中国的院士》一文中，我曾用这样的话结尾：“中国有句古语：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对中国的学术界来说，也同样：院士不废，学术无望。”一位院士在媒体上反驳说，欧美也有院士制度，人家的学术不是好好的吗？(张静：《科学界有七种不道德行为》)。

国家科学院院士制度是欧洲在十七世纪起开始逐渐形成的，其目的实际上有两个：一个就是要通过专制政府的承认来提高科学家的地位，另一个就是要在学术界内部建立一个权威，以促进科学研究的规范化，提高学术研究的水平。在 21 世纪的今天，院士制度的这两个功能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欧美科学院已经完全转变成了荣誉团体。这是因为，首先，由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及其巨大，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相当高的，不再需要通过政府的承认这样一个落后的手段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其次，科学研究的规范已经基本形成，各个学科一般都有自己的本国的和国际学会，他们组织定期集会并且发行出版物。再其次，科学的发展，学科的分化，新的学术领域的不断出现，使“学术权威”这个概念不仅是落后的，而且是愚昧的。实际上，现代西方学术界目前正处在一个你追我赶、新人辈出、新老交替时刻发生的时期，一个人可能领先一时，但决不会领先永远。因此，在那里，几乎没有人敢于并且乐于象中国院士那样被树立为学术权威。再说，学术权威即使有，那也是在学术界内部自发地产生的，而不是由外界任命的。所以，在西方，称号和荣誉是对一名科学家过去贡献的承认，而不是为他将来的学术地位的确定。有人说，中国院士与欧美院士的最大不同就是，当你与中国院士交谈时，他们最想告诉你的就是他们是院士；而当你与欧美院士交谈时，对方总是忘记自己是个院士。

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和《中国工程院章程》，“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国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这就不仅仅是承认他们以前的贡献，而是在确定他们以后的终身学术地位：他们有官衔，有津贴，他们有特权，他们有地位。“在官本位的官场，院士是高官；在钱本位的社会，院士有厚禄；在以知识为本的学术界，院士是法定的权威；而在优胜劣汰的生物界，院士是永远的胜利者。除此之外，许多院士还控制着国家科研经费的分配权力。”(亦明：《中国院士制度的演变》)。

所以，即使中国的院士真的是一些能够与欧美院士在学术水平上不分高低、在道德水准上不相上下的人，在这样荒谬的制度下，他们也会被惯得成为无赖泼皮，更何况他们当中很多人本来就是靠无赖的手段当上院士的。实际上，中国院士学术水平之低劣，在世界大国和经济强国之中，是绝无仅有的。把他们确定为“学术最高”，就如同把武大郎的炊饼铺钦定为全国唯一的五星级饭店，这实际就是在告诉世人，你们再好也得比他们少一颗星！真不如干脆明说：不允许你们比他们强。这样的制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耻辱！

4 中国的院士制度遏制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院士制度的建立，其本来目的是要促进科学技术的向前发展。但在中国，这个制度所造成的结果却恰恰相反，它实际上是在阻碍、遏制中国在这方面的进程。

如上所述，目前的国际学术界正处在一个你追我赶、人人力争上游的时期。人为地确定

“最高”，实际上就是在阻止新人的出现，阻挡人们对学术的追求，而把精力放在了对院士这个称号的追逐之上。不仅如此。中国的院士还在利用手中的权力，霸占科研经费，抢夺他人的科技成果，并且一个人占据好几个人的位置。(李健、张东操：《署名剽窃兼职过多 让院士和学术以外的东西脱钩》)。那个在去年非典期间暴得大名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在 2002 年的机构调整中，建立了这么三个实验室：朊病毒实验室，腹泻病毒实验室，洪涛院士实验室。而这三个实验室的前身只有一个，就是病毒形态学与腹泻病毒实验室。(徐彬：《“疾控中心问责事件”再追踪》)。也就是说，多出来一个院士，不仅多出了两个实验室，而且其中之一是连自己都不知道搞什么的“院士”实验室。难怪这些人不仅不能为国家分忧解难，反而为国家添乱。笔者就曾亲眼看到，一个所谓的资深院士，控制着价值数百万元的实验室，而里面却空无一人。就因为他是院士，别人对他敢怒而不敢言。也是这位院士，手里摇晃着几张印着早就被存放到 GenBank 的基因序列的纸，宣称那是什么科技机密。可见他的那点儿知识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的水平。

实际上，那些早就丧失了创造能力(其实他们之中很多人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创造能力)的“权威”们，最可怕的就是被别人瞧不起，怕被别人超过去，于是他们在学术界培植了一个个嫡系，一个个帮派，帮派之间竞争的目标不是谁有了新的学术成果，而是谁得了奖，谁捞到了大钱，谁的弟子当上了院士。那个今年又把非典病毒释放出来的实验室，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腹泻病毒实验室，其主任就是洪涛院士的得意门生。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院士制度还给中国的学术新人树立了这样的榜样：认真干活搞研究的人是笨蛋，而能够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的人才是具有领袖才能的“牛人”。

面对社会上对中国院士制度的指责，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寿荣和中国工程院的研究员郝小林曾专门撰文反驳。(张寿荣、郝小林：《院士制度不是误区》)。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提出了三个论点：1，“院士制度在世界上普遍存在”；2，“院士制度不会‘必然’阻碍创新”；3，“院士制度促进我国工程科技创新”。对于任何了解中国学术界现状并且思维正常的人来说，仅看看这三个小标题就会哑然失笑。“在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院士制度与中国的半封建、半官僚、半土豪恶霸帮会性质的院士制度是一回事吗？“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院士与中国的院士是在一个水准之上吗？至于说中国的“院士制度不会‘必然’阻碍创新”，中国的“院士制度促进我国工程科技创新”，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远的不说，就从 2003 年非典研究说起。当时如果没有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洪涛力主衣原体病原说，压制其它不同观点，中国军事科学院的科学家怎么会吓得把自己发现的冠状病毒证据藏起来，不敢公诸于世？如果他不是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还会围绕着他的错误假说组织联合攻关吗？

其实，类似洪涛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学术界多得数都数不清，只不过洪院士造成的危害太大了，所以才最终暴露了出来。实际上，就在不久前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中国的院士们终于承认“在中国科技发展的进程中，缺乏‘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浦树柔、戴廉：《两院院士：缺乏“自主创新核心技术”是中国软肋》)。可奇怪的是，这些院士虽然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及其严重性，但这个问题只是他们“最为关注的话题”，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表现出深深的担忧”。这看上去似乎是说，这个问题是别人造成的，中国的院士们是局外人，没有任何责任。可事实却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院士制度。

为了替中国的院士制度唱赞歌，张寿荣院士在文章中作为论据一再提及几个老院士的贡献，其中就有钱学森和张光斗。钱学森院士鼓吹“亩产万斤”理论在先，提倡“特异功能”在后，时至日薄西山的今天，仍旧不肯向社会向人民赔礼道歉，不知还在等待什么。而张光斗院士更是枉为学者。如果说钱学森的一生是功过相抵的话，终张光斗一生，是功不抵过。(亦明：《超一流的梦想，不入流的作为：评清华大学计划在 2020 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把这两个人拿出来为中国的院士制度辩护，可见这个制度的腐朽和黑暗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根据中国工程院网站介绍，张寿荣院士生于 1928 年，目前是武汉钢铁公司的总工程师。

在一篇述怀性质的文章中，张院士是这么结尾的：“社会主义强国必须是钢铁强国。作为长期从事钢铁冶金的工程技术人员，我必须奋发图强，为建设钢铁强国努力奋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张寿荣：《我的人生》）。从这些与政治口号没有什么差别的语言中，我看不出它含有一点一滴的学术气息和科学精神。请问张寿荣院士：在您担任总工程师的武汉钢铁公司，其先进生产技术、先进生产设备中，有多大比例是自主研发的？在全世界，有哪家象武钢这么大的企业用一个年逾古稀、正规教育在半个世纪前完成的老人担任总工程师？曹操在写“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诗句的时候，只有 52 岁。对于政治家，那正是黄金年龄。而您呢？不仅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早已杳如黄鹤，事实上您的生理年龄也已接近尾声，您的恋栈不退，到底是为了什么？您声嘶力竭地为中国的院士制度呐喊，又为的是什么？您“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是在为谁而战斗？

总之，中国的院士制度对中国的学术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在半个世纪前建立院士制度确实有其可取之处。但这个制度演变到今天，已经完全成了另外一种东西：它是学术腐败的摇篮和温床。“院士不废，学术无望”，不是“个别极端人士”的妄语，而是具有学术良知人们的共识。（顾海兵：《院士制度——中国科技创新的障碍》；顾海兵：《人才问题上的六大误区》）。一位“长期在第一线的普通的科研工作者”在读了我的《从 SARS 研究看中国的院士》一文后写到：“院士们应该扪心自问：国家给你们那么多待遇，不给国家作贡献已经很羞愧了，若再在有生之年破坏、阻挠中国的学术发展则实在太可耻了，千古罪人啊！”（肖斌：《现行的院士制度不废，中国学术无望》）。

废除院士制度最彻底的途径就是通过人大立法来解散中国科学院学部和工程院，而他们的某些职能，如充当政府的科技顾问，完全可以由各个专业学会或中国科协来承担。但在实际中，废除现有院士制度的最有效途径就是要釜底抽薪，要取消他们的副部长级别，取消他们的特殊物质待遇，取消他们在分配科研基金、评定科研成果等方面的特权，限制他们的兼职，并且要坚决处理那些欺骗政府和社会、剽窃掠夺他人成果、以及在科学研究中明显不称职的院士。没有了特权，没有了物质利益，没有了这样那样的好处，那些名利之徒就不会对院士头衔趋之若鹜，如蝇逐臭。废除现有院士制度的另一个有效途径就是要扬汤止沸：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公布所有院士及院士候选人的科研成果清单及相关资料，也就是他们的论文和在国际学术界获得的奖励，并且附上发表论文杂志的影响因子、论文的引用次数，等等。互联网这么发达，做到这一点极为容易，而不这么做却一点儿理由也没有，反倒说明院士们心虚。就象当年齐愍王要乐师单独吹笙一样，公布院士的学术成就就会使那些南郭先生们自动地逃之夭夭，根本就不用谁去撵他们。

如果这两条计策真的被采纳了，中国的院士制度实际上也就与目前欧美各国的院士制度相同了：院士是一个纯粹的学术荣誉称号，仅此而已。如果真的是那样，这个制度废不废除，还有什么关系呢？

也许有人会问，废除了院士制度，学术腐败问题就解决了吗？回答是一个大大的 YES！这是因为，院士制度这颗毒瘤如果能够被摘除，本身就说明中国政府和社会有决心、有能力解决中国的学术腐败问题，因此其它问题都会势如破竹般地迎刃而解。反之，不摘除或消灭这颗毒瘤，学术腐败就会象患有癌症的病人一样，病症永远都不会减轻和消失，而只会越来越严重。

（二）归真返璞、顺天应理、量力而行：让学术界对社会有用

前面说过，目前中国的学术界就象是一个靠服用人参汤来维持其纵欲能力的病人一样，他不仅不承认自己身体虚弱，反而以为自己上炎的虚火是精力旺盛的象征，于是一会儿吵吵要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一会儿又嚷嚷进入世界科技强国前十名。用老百姓的话说，这是在“作死”。学术界“作死”不仅耗费了大量国家资源，而且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它不仅成了这个社会的废物，而且成了有害物质。如何让这个无用有害的东西能够自食其力，

并且对社会做出它本来应有的贡献呢？

古人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意思是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及因果关系。知道了这个过程和关系，也就触摸到了事物的发展规律。那么，就让我们来探索一下学术界的发展过程吧。

1 大学的理念：大学是搞教育的地方

现代高等教育的基本形式，也就是大学，起源于欧洲，至今已经有大约八、九百年的历史，占欧洲文明史的大约三分之一。欧洲最早的大学，如波伦纳大学和巴黎大学，都是自发形成的，所以他们没有一个明确的诞生日期。一般认为，波伦纳大学诞生于十一世纪后半叶，巴黎大学则在十二世纪中叶左右具有了雏型。在此之后，英国有了牛津、剑桥大学，德国有了海德堡大学、莱比锡大学。到十五世纪，西欧大约有 80 所大学。1636 年，英国移民在到达北美洲之后的第六个年头就仿照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个学院建立了哈佛大学。

欧洲的大学起源于行会的职业教育，如律师、牧师、医生，等等。美国的哈佛和耶鲁大学在最初就是以培养牧师为主要目的的。同时，职业教育的基础是所谓的“自由艺术”（liberal arts），也就是古希腊文化中认为自由人所应该掌握的一些艺术和知识，其具体内容包括“三文”（trivium）和“四数”（quadrivium），合称“七艺”（septem artes liberales）。“自由艺术”教育至今仍旧是美国本科教育的主流，尽管其内容早就不再是“七艺”了。

目前，世界上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是美国。现在，美国有高等院校三千余所，按照所谓的“卡耐基分类”，它们分成博士授予学校、硕士授予学校、学士授予学校、协学士授予学校、专业学校、和部落学校六大类，其中博士授予学校还分成研究型大学和博士类大学。按学生人数来说，研究型大学的学生占美国大学生总数的不到五分之一；按学校数量来说，它们只占不到 5%。一般来说，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佼佼者都是世界一流大学。那么，它们是怎么来的呢？答案是它们来自德国的柏林大学。

1806 年，普鲁士在与法国的战争中遭到惨败，国土丧失了一半。1807 年，在拿破仑军队占领下的柏林，哲学家费希特连续作了十四次《对德意志人民的讲演》。在这些讲演中，费希特告诉自己的人民，教育是法国人留给德意志民族的唯一可以自由运用的东西。他说，教育，只有教育，才能够解放德意志民族的所有潜能。他提议通过兴办教育来唤醒民族意识，靠教育来提高民族素质，靠教育来增强国力。在著名教育家洪堡的倡议下，普鲁士于 1810 年建立了著名的柏林大学(Friedrich Wilhelms Universität Berlin)，费希特任校长。这所大学在问世之后的很短时间就闻名世界，其声望甚至超过了老牌的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目前世界的名牌大学几乎都曾从它那里吸取了办学思想，因此这所大学被称为世界“现代大学之母”。

柏林大学能够一鸣惊人是因为它有两个独到之处：第一，它把自然科学引入了大学课堂，第二，它强调学术自由。在柏林大学成立之前，科学研究主要是科学家的个人行为，尽管有些科学家们组成了一些叫做“科学院”的团体，并且得到欧洲王室的承认，但他们在大学中并没有位置。柏林大学建立后不久就整合了普鲁士科学院，并且鼓励教授从事科学研究，从而使自然科学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柏林大学的学术自由，既表现在学校容纳各种不同的思想，也表现在学生可以选择不同的导师、不同的课程、不同的发展方向，更表现在教授可以从事教学和科研，创造知识。学术自由保障学者的头脑可以无所顾忌地思考问题，提出新的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柏林大学在东德境内，改名洪堡大学。洪堡(Freiherr von Karl Wilhelm Humboldt, 1767-1835)是德国哲学家、教育家。他在 1809 年任普鲁士内务部教育厅厅长。洪堡的教育思想核心就是要通过教育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也就是所谓的全人教育。他认为，初等教育的目的主要是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提高他们的理解力，训练他们的判

断力，培养他们理性思维的能力，建立良好高尚的道德情操，激发他们对宗教的感情，为他们进行学习做准备。中等教育的目的是进一步开发学生的智力，使他们学会如何学习。高等教育的目的首先是要使学生了解各门学科的统一性，其次则要培养学生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大学教师的任务就是要指导学生从事研究。需要指出的是，欧洲大陆当时的教育体制与美英体制不完全相同，德国的中等教育实际上相当于美国大学本科的前两年，所以洪堡的大学毕业教育思想应该认为是研究生教育思想。

虽然哈佛大学早在 1820 年前后就向德国派出留学人员，但美国大学的正式德国化是在南北战争之后。1876 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几乎完全按照德国大学的模式建立，并且大获成功，洪堡的教育思想在此之后可以说是风靡美国高等教育界。其后果就是，各个大学重视学术研究，重视研究生教育，但是却忽视了本科生的教育。

德国大学模式风行北美大陆，其真实原因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以及美国工业革命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也就是说，美国大学的德国化是适应时代的潮流。不过，研究生教育的实质是专业教育，而没有坚实的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又从何谈起？慢慢地，美国的大学开始了反思。他们比较了英国和美国的高等教育，发现牛津剑桥培养出来的学生文质彬彬，风度优雅，谈吐不凡，见识过人。而美国的本科生则知识贫乏，修养不足，在社交场合就如同进入瓷器店的野牛一样，粗鄙笨拙。另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是东欧犹太人大举移民美国之时，而他们的子女在大学，尤其是精英大学中的比重也急剧上升。大学的目的是到底是什么？美国人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文化如何能够在德国日尔曼文化的强大势力下继续保存下去？

针对上述问题，美国的大学在十九世纪末开始了向英国教育的回归，其主要表现就是校园建筑的哥特风格，用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的话说就是，要把美国大学的盎格鲁印迹刻到石头上。除了建筑，回归英国运动还体现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分别建立了牛津剑桥大学式的住宿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建立导师制。本科教育英国化，研究生教育德国化，职业教育美国化，这实际就是芝加哥大学的建校宗旨，而芝加哥大学也确实被誉为“第一所美国式的大学”。

不过，对抗德国化最为强劲的力量不是来自这些研究型大学，而是那些英国式的学院。美国至今还有六百多所四年制的独立本科学院，也就是所谓的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也译为博雅学院或自由艺术学院，均通)。这些学院还保持着美国大学德国化以前的传统，以传授知识为主，不搞创造知识的学术研究。它们之中最优秀的，不论在学术声誉还是教学质量上，与常春藤学校相比毫不逊色，如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三大”(Big Three)齐名的“三小”(Little Three)：Amherst College, Williams College, Wesleyan University，以及驰名世界的“七姐妹”女子学院，他们录取本科生录取标准与常春藤学校几乎不分上下。在二十一世纪之前，美国 28 位拥有学士学位的总统中，有 9 人毕业于这类学院；11 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总统夫人中，7 人曾在这类学校读书；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五分之一从这类学校获得学士学位。1975 年，思沃斯茅学院(Swarthmore College)的两名毕业生(David Baltimore 和 Howard Temin)同时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再加上三年前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校友(Christian Anfinsen)，这个规模只有千余名学生的学校，校友在三年内获得的诺贝尔科学奖奖牌就超过了斯坦福大学校友在 20 世纪获得的总和(两枚)。实际上，思沃斯茅学院的这个成绩与哈佛大学相比也毫不逊色：在 1998 年前，总共有 11 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拥有哈佛大学的学士学位，但哈佛大学本科学院的规模比思沃斯茅学院要大四倍左右。同样，与思沃斯茅学院规模相似的阿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 也培养出了三名获得诺贝尔奖的校友。所以说，这些在强大的德国化风潮中坚持下来的自由艺术学院，虽然不是世界一流“大学”，但完全可以称为世界一流“学院”。

那么，大学的理念到底是什么呢？英国教育家约翰·纽曼(John Henry Newman)在他的

名著《大学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中是这么说的：大学是传授全方位知识的地方。如果它的目的是科学发现，它根本就不需要有学生；如果它的目的是培养宗教道德，它也不需要文学和科学的位置。

谁都明白，教学和科研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社会活动，他们在二百年前偶然地在柏林大学相遇，并且风靡至今。但这并不能够说明这个结合就是绝对的合理。第一，科学研究完全可以在独立于大学的机构完成。第二，从事教学和从事科研需要的是不同的人才。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议员们对加州大学教授注重科研而轻视教学而发出了这样的呼声：“如果你们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我们会尽量满足你们在学术上的雄心壮志。”这实际上是说，教育孩子是大学教授的本职，而科学研究是他们的副业。

明白了吗？大学应该是培养学生的地方，这是大学存在的唯一理由，唯一目的，唯一功能。而一流大学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能够培养出一流的人材，而不是相反，靠花大价钱招买一流人材。忘记这一点，任何一流大学研究都是荒谬的。斯坦福大学之所以被人讥为“诺贝尔黑洞”，就是因为他的教授队伍先后有大约二十名诺贝尔奖得主，但他培养出的学生中，获得诺贝尔奖的却屈指可数。(舸听：《从哈佛到斯坦福》)。那种“一流学者培养一流人材”的所谓“大学的逻辑”，实际是忘记了两个大前提：第一，二流或不入流的学者招不来一流的学者；第二，一流的学者并不一定是一流的教育家。其实，在中国大学决策者的眼中，那些“一流的学者”不过是些会下 SCI “金蛋”的鸡鸭，而根本就不是会哺乳后代的奶牛。所以，真正的“大学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由一流的教育家招募一流的学者，这些学者以教书育人为自己的天职。他们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自己的教学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他们的研究促进了教学，从而培养出一流的学生。实际上，一流学者中，不能作为师表或不愿意为人师表的大有人在。他们尽可以到研究机构去搞自己的研究，为什么还要挂一个名实不符的教授头衔？那些学而不严却毁人不倦的校长、学者们，对你们来说，最好的逻辑是这样的：先把自己打造成一流教育家，然后再谈什么一流大学。

唐朝文学家柳宗元曾写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题目叫《种树郭橐驼传》。郭橐驼是个罗锅，最拿手的绝活就是种树。他种的树，高大茂盛，结果又早又多，是长安城内名牌产品。别人问他，你种树的诀窍是什么？他回答说，“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柳宗元为郭橐驼立传当然不只是因为他会种树，而是要“以子之道，移之官理”，探讨“养人术”。郭橐驼的“养人术”就是“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不害其长”、“不抑耗其实”，其实质就是不要扰民。所以，教育部的官员们如果真的想要一流大学，就不要今天一个工程，明天一个项目地瞎折腾；中国的大学校长和书记们如果真的想要自己的大学成为世界一流，也不要今天“迅跑”、明天“跨越”地瞎忙活。大学不是政治家手中的一粒棋子，大学校长也不是政治家马前的走卒和鹰犬。连这一点都搞不懂，还侈谈什么世界一流！

2 学术研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科学研究分为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大致来说，基础科学研究是对自然现象的探索，也就是所说的“创造知识”，而应用科学研究是利用已有的知识来创造财富。应该承认，基础科学研究对人类文明进化的作用是长远的，巨大的。但是，从事基础科学研究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这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负担。目前，中国社会的经济不平等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全社会的多数人，也就是那些农民和工人，实际上是在生存线附近挣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拿出巨额资金来搞基础研究，不能说是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资源。著名科学史学者 W. C. 丹皮尔在《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中曾指出，“人类历史上有三个学术发展最惊人的时期：即希腊的极盛期、文艺复兴时期与我们这个世纪。这三个时期都是地理上经济上发展的时期，因而也是财富增多及过闲暇生活的机会增多的时期……记住这个事实也许是有好处的。”这就是说，从

古至今，纯学术研究的长足发展都依赖于社会财富的大量积累，有才能的人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换句话说就是，社会财富积累在先，学术发展在后。因此，想要通过纯学术研究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见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科发基金字[2001]81号文件：《关于加强基础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见》)，是与历史事实相悖的。

其次，基础科学研究是科学家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而科学的热点是一流科学家的角斗场，二流、三流科学家即使拿出全身解数也极少可能争得一席之地。如果承认中国学术界目前学术水平与世界一流之间的差距，那么仍旧迫使他们参与这个角逐就极为愚蠢：这就象是要倾全国之力，非要让中国足球队夺得世界冠军一样，他们除了丢人现眼之外，还在浪费中国社会的资源。

第三，基础科学最前沿的研究一般都属于非定向探索，很多重大突破都是随机发生的。这是因为，科学研究首先是科学家的精神活动，它的原动力就是自己的兴趣。而目前中国的所谓基础研究，绝大多数属于所谓的“跟踪”性质，也就是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跑，拣人家的残羹剩饭。这本身就决定了这类研究的等级，不外是什么“国内一流”、“填补国内空白”之类的自欺欺人。

第四，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人人可以享用。充分利用这些精神财富来创造物质财富，也就是搞应用研究，搞技术发明，搞知识传播，不论是就中国的国情来说，还是就中国学术界的水平来说，都是恰当的，合适的。所以说，中国的学术界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吸收消化已有的知识上，利用这些知识来服务国家、造福社会。具体地讲就是，大学在教学上，要以讲授科学前沿知识为主要内容；在研究上，要以解决社会需要为主要目标。这是日本在二战后经济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经验，也是国际有识之士对我们的忠告。2002年，针对中国学术界近年来提出“中国需要诺贝尔奖”的口号，剑桥大学校长布罗厄斯建议说，中国大学应该把自身的资源集中于具有广泛效益、有潜能、有应用性的原创性科学研究。(夏红卫、程瑛：《剑桥校长剖析剑桥奇迹》)。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学术界都素有象牙塔之称，意思是它们脱离于尘世之外。确实，在美国目前的名校之中，只有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曾经放下架子，敢于与工商企业界为伍。实际上，他们之所以肯这么做，主要原因就是要摆脱本身发展所处的困境，即资金短缺。社会是发展的，以前人们不以为然的事情，在今天可能被人们普遍接受。同样，在今天人们还不习惯的事物，在将来人们可能会认为理所当然。麻省理工学院建校之初，其它学校对它的实用主义倾向嗤之以鼻。但到了今天，它的成就却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学校所无法企及的。六十年代，有八百年历史的英国老牌大学，剑桥大学，终于放下了架子，效仿斯坦福大学建立硅谷的经验，在剑桥周围建立了科学园。所以，从事应用科学的研究开发，不仅没有降低中国学术界的身份，而是适得其所地提高了自己。

战国时代，齐国大臣田忌与齐王诸公子赛马赌博，屡战屡败，因为田忌的马匹比不上王室的马匹。田忌的幕僚孙臏于是向主人献计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也就是用自己的下马对齐王的上马，用自己的上马对齐王的中马，用自己的中马对齐王的下马。结果，田忌以三战两胜一负的成绩赢得千金。(《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这被某些人称为世界最早运用运筹学的例子。

从田忌赛马的故事中，中国的学术界应该学到点东西。学什么呢？首先就是要实事求是，有自知之明，承认如下事实：中国仍旧是一个穷国，没有本钱玩富人的游戏；中国的学术水平比世界一流至少要差两、三个数量级，没有资格参与这个游戏。其次，要量力而行，不要和比自己强大的对手硬碰硬，拼傻劲，要选择自己擅长的领域与对方周旋。而应用科学就是这样的领域。一般说来，应用科学的研究开发对人的素质要求比基础科学研究要宽松一些。这是因为，基础科学研究的关键就是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而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并不很多，即使在欧美学术界也是如此。而应用科学的研发则不同，它面对的是已经存在的问题—社会

和市场已经把问题提了出来,这就意味着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不再需要具备科学家的某些稀有的素质。这么说,并没有贬低应用科学研究的意思,它不过是社会现实,也可以理解为社会分工不同。实际上,MIT 的师生(主要从事应用科学的研发)在面对哈佛大学的师生(主要搞基础科学研究)时,并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所以,中国的科学家也不要对搞应用科学感到不好意思。

古人云,“归真返璞,则终身不辱。”(《战国策·齐策》)。这可以理解为一个人放下自己的架子,摘下自己的假面具,会活得轻松一些、自然一些。干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情,干点儿自食其力的事情,干点儿造福社会的事情,岂不比干那些自己都搞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东西的 SCI 强百倍千倍万倍? 如果中国的学术界都在干自己有能力干的事情,他们还用得着去偷、去抢、去骗吗? 从古到今,自取其辱都是因为不自量力。两千多年的人都把这个道理搞懂了,21 世纪的中国院士、博导们怎么还这么糊涂呢?

3 引入竞争机制,建立全新的学术系统

当然,一个社会如果放弃对完美和崇高的追求,它的最终结局就是平庸和堕落。学术界也是这样。如果中国的学术界仅仅满足于向学生传授知识,满足于利用别人创造的科学知识来解决眼前的问题,它就永远也不会升华到更高的境界。

问题是,靠中国目前的这批学者,在目前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国社会对他们的最大期望只能是不要再继续堕落,不要再进一步腐蚀社会,超过这些的都属于奢望。我们甚至不能够寄期望于现在层出不穷的新科博士,他们的知识、能力、和道德观念完全出胎于目前的学术界。青出于蓝而青于蓝,他们很可能会黑上加黑。

其实,说“中国学术界的学术水平低”,是有两层含义的。第一,从绝对值来讲,他们的水平确实低,与欧美诸国不能相比,与日本、南韩不能相比,即使与印度、台湾、新加坡、香港相比,也有相形见绌之感。其次,从相对意义上讲,中国的学术界表现出来的学术水平比实际水平要低。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界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可以这么比喻:欧美学术界的学术实力和表现水平为十,而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实力为五,表现水平为三。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原因就是逆向淘汰、劣胜优败:学术界被那些不搞学术的学术官僚控制了,他们一心要搞的是轰轰烈烈的舆论声势,搞没完没了的这个工程那个工程,所以这些人的水平成了中国学术界整体水平的代表。而那些真正有学问的人,由于干不过那些善于搞弄虚作假的骗子,所以反倒没有了出头之日。

除了那些具有一定科学实力、并且具有一定科学良知的“体制内”学者,中国还有一个巨大的学术宝藏,那就是十几万海外留学大军。尽管他们的水平参差不齐,良莠俱在,但总体上说,他们是中国人中最接近西方科学的人力资源。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有回国工作的意愿,但由于中国学术界的逆向淘汰机制,使他们踏不进中国学术界的大门。(亦明:《中国学术界的海龟与土鳖之争》)。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如何让那些真正的学者成为学术界的主导、主流,如何让中国的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正式接轨呢? 目前看来,唯一的可行之途就是另建一套全新的学术系统,它既可以容纳那些真心搞学问的中国学者,而且能够对那个腐败的系统施加竞争压力,促使它改革。

大约一年半前,当我首次提出另建一个学术界来对抗学术腐败的主张时,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它的“可操作性几乎为零”。(闲云野鹤:《评亦明的“把反学术腐败的斗争进行到底”》)。其实,在目前的中国,这样的“另类”学术系统已经开始出现。以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耶鲁大学教授邓兴旺领衔建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就是这个“另类”学术系统的桥头堡。根据这个研究所的网站介绍,尽管该所“依托北京市政府和科技部,并有国家计委、教育部、中国科学院等 8 个部委支持”,但它“依法登记成立,具有事业法人资格,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不仅如此,它还宣布:“北京生命所希望在科研体制运行上

改变中国现有的、不符合国际先进标准的、不利于中国科学良性发展的模式。”(见该所网站：<http://www.nibs.ac.cn/firstlink/jianjie.asp>)。虽然据说这个所在成立之初曾与中国的学术界发生种种磨擦(主要是争夺人事权)，并且可以想象这类磨擦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剧烈，但我祝愿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能够坚持自己的学术原则，一往无前：假使万一到了坚持不下去的地步，也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绝不向他们妥协，绝不与他们同流合污。

除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在中国学术界内部，还有零星的“学术特区”。比如，成立于1999年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在美国著名科学家蒲慕明博士的领导下，在短短几年间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宗宝泉、赵如江：《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创新发展纪实之人才篇》)。实际上，神经科学研究所的成功也正说明中国科学院体制的失败。就象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说明旧的经济体制失败一样。不过，神经科学研究所的成功能否延续下去却是一个疑问。在很大程度上，蒲慕明博士是这个所能够取得成功的唯一保障。假如蒲先生一旦驾鹤西去，这个特区很可能被毁于一旦。这就是体制内改革的可悲之处：他们是被利用的对象，因而没有独立的人格。

无论如何，仅仅有一、两个研究所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另类”学术系统的中坚应该是一所或几所优秀的大学。这些大学的独特之处就是它的独立性和非牟利性。所谓独立性，就是他们既不是什么局级单位，也不是什么部级大学，而是由一个独立的、唯一使命就是维持这所大学的正常发展的董事会控制，该董事会的成员不得从这所大学获取任何个人利益。所谓非牟利性，是指这所大学以学术和教育为唯一目的，以提供一流的教育为自己的最终发展目标，而不是为了谋取经济上的利益。在这所大学，教授应该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和精深专业知识，他们勇于进取，与人为善，他们有强烈的事业心，他们热爱教育事业，他们讲究诚信，注重职业道德，他们堪称师表。这所大学培养出的学生应该具有极强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有旺盛的创造力和开拓精神，他们既敢于干大事，也肯于、善于干好每一件小事。

应该说，象中国这样的大国，不论是经济实力，还是人力资源，建立这样一所甚至几所大学都是完全可能的。对政府来说，与其把巨额资金投入到现在大学，试图把他们改造成世界一流大学，莫不如拿这笔钱另起炉灶。实际上，不论国家投入多少钱，在现有体制下，中国的现有大学都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但假如教育部把“985”一期工程的数百亿元人民币拿来建立新型大学，中国出现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不仅会大大提前，而且数量也会大大增加。

当然，就目前来说，要政府出钱建立独立的学校并不十分现实。其实，这笔钱根本就不用中国政府来拿。据悉，香港爱国实业家李嘉诚先生为了建设汕头大学，先后投资总额已经超过20亿港元。实际上，如果社会效果好，这样的投资会越来越多。不过，从1981年建校到如今，汕头大学办得不能说是成功的。至少，它的学术声望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据汕头大学网站介绍，目前汕大有博士点4个，硕士点39个。而成立年代比他们早不了几年的湘潭大学(1974年恢复建校)，却有博士点9个，硕士点69个。虽然得到这些学位授予点的过程中充满了肮脏的交易(亦明：《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但它的数量的多少却能够说明一所学校在这个体制内的地位。从这一点来说，汕头大学在中国学术界内“混”得不是那么滋润。其主要原因，就是它陷入了中国学术界的泥潭之中。实际上，汕头大学的“失败”正说明另建一套学术系统是必要的。而这个系统的关键，就是要独立于现有的体系，摆脱它的干预和控制，免得受其污染。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任何尝试都会以失败告终。

除了鼓励利用民间资金建立私立大学，中国政府还应该考虑恢复以前的教会大学。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如北京的燕京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都是外国教会主办的大学，也都是当时中国的一流大学，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材，如燕京大学的季羨林、周一良、谢冰心、吴阶平、蒋严永；金陵大学的陶行知、陈祯、王应睐；圣约翰大学的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等等。这些学校

在 1952 年前后或者被关闭，或者被其他学校兼并。由于这些学校尚有一些校友在世，而它们很可能与创建学校的教会保持联系，因此恢复这些大学，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办学道路。

一般认为，宗教与学术，尤其是科学，格格不入，所以教会学校的学术水平会比较差。但实际上，美国目前常春藤联盟的八所大学中，有七所是教会建立的。这些大学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与教会脱离了关系，而那些教会并没有为此耿耿于怀。这是因为，教会办学是出于自己的信仰，而不是要谋取回报。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事实是，上面提及的中国教会大学在中华民国时代其宗教内容就已经很少，多数设置文、理、工、医、农等学院。金陵大学早在 1928 年就撤销了宗教系，宗教课程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宗教仪式也改为自愿参加。所以教会大学实际是由教会出资开办的相当正规的大学，他们都有非常优秀的学术传统和严谨的学风。1947 年，胡适在出任北大校长时说：“假如国立大学不努力，在学术上没有成就，很可能是几个教会大学取而代之。”（转引自：段玉明：《另一种国家研究》）。由此可见他们当时的学术水平已经直逼北大清华。其实，从长远来看，宗教对一个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相当大的正面作用。就现今来说，宗教并没有排斥科学，科学为什么非要和宗教过不去呢？退一万步说，大学教育也不单纯是科学教育。

总之，另建一套学术系统是必要的，可行的，是对中国有着莫大的好处的。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之所以迎来了空前的学术大繁荣，就是由于当时有百家在争鸣。在半个世纪前，中国的高等教育之所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培养出了许多人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当时的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三足鼎力，互相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而目前中国大学之间的勾心斗角，那不叫竞争，而叫窝里斗，因为他们不是在比试谁会更好，而是在比试谁能使对方更差。所以，中国政府应该放宽眼界，敞开胸怀，积极地支持、扶持、甚至资助这个系统的发展和完善。应该认识到，它是目前中国学术事业的唯一希望。

（三）以人为本，放眼未来：用新文化培养下一代

前面说过，造成中国学者素质低下的原因是复杂的，多远的。虚伪的文化传统，蛮横的政治权力，愚昧的教育制度，再加上长期的贫困，使这些素质低劣的“中国学者”的出现显得是那么的合情合理，那么的顺理成章。所以，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如果真的需要知识分子这个“头脑”，我们就必须从头开始，培养新一代“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一代新人将由世界的先进文化来武装，他们掌握最新的科学知识，他们拥有源源不断的创造能力，他们胸怀崇高的道德情操。更重要的是，他们将具有自己的独立人格，而不再对权威毕恭毕敬，对权力卑躬屈膝，对金钱疯狂崇拜。什么时候这一代人出现了，并且登上了中国社会的舞台，得救的将不仅是中国的学术界，而是整个中华民族。

也许有人会说，那得等多少年啊！它至少要花几代人的时间。是的。这个目标不大可能在二十年内达到，也可能在一百年内都达不到。但是，只要我们认定了目标，选对了道路，我们就有希望。人类存在的意义不就在于对未来的憧憬吗？再者说，急功近利，投机取巧，不肯下苦工夫努力，正是中国文化的糟粕。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年的新文化运动没有沿着五四运动的方向发展，而是趁着进入共和之机，踏踏实实地建立一套新的文化，中国社会目前这些腐朽的东西很可能根本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所以说，我们在走了近百年的弯路之后，最终还是要绕回去重头走起。

那么，什么是新文化呢？陈独秀在八十多年前曾阐述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新文化的中心内容就是：提倡科学，利用科学方法“研究、说明一切学问”；改革旧道德观，“把家庭的孝弟扩充为全社会的友爱”；重视美育，改良中国人的生活恶习。（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值得一提的是，陈独秀在这篇写于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的文章中，对宗教的积极作用给予了肯定，并且公开承认自己以前对宗教的认识是错误的。

实际上，今天的新文化运动也不过是大致如此。所谓新文化，就是综合了世界各民族文化中最优秀的成分，再加上由中华文化中剔除了糟粕之后的那些内容组成的文化系统。详细

阐述这个系统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也不是笔者所能够胜任的。但一般来说，我们就是要吸取西方文化中服从理性、追求真理、追求完善、永不满足、锲而不舍、兢兢业业的精神。而中华文化中，最大的糟粕就是它的虚伪性。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中所列举的那些素质，其核心就是虚伪：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拐弯抹角，言而无信、表面自高自大，内心自卑自鄙，等等。除去了这个虚伪性的中华文化，就会象是一个人摘下了头上的假面具，摆脱了身上的桎梏一样，换来一身轻松。反之，只要这个虚伪性继续存在，中国的文化永远也不会是新的，新文化运动必将以失败为结局。

中国文化的虚伪性最集中地表现在教育制度中。中国目前的教育，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博士教育，实际上就是给受教育者化妆，蒙上面具，戴上枷锁，系上镣铐，最终把他们培养成了只能在中国文化这个大酱缸中起伏翻滚，但却丧失了所有其它能力、甚至正常生活能力的人。在这个制度中，家长分明是在迫害孩子，却要说是为他们好；老师分明是在图财害命，却要把自己打扮成高尚的园丁；整个教育制度分明是在祸国殃民，但它却成了中国政府仅次于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成了中国家庭仅次于购房的最大经济负担，也成了中国与医疗卫生并列的吃人产业。这么愚昧、这么野蛮、这么荒谬的制度，竟然能够在中国能够长盛不衰，并且欣欣向荣，实在是整个人类的奇耻大辱。它是中华民族慢性自杀的毒药，是华夏之邦自我毁灭的刮骨钢刀。

所以，二十一世纪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就是要搞教育革命。要从小学教育入手，一直到大学、到研究生院。改什么呢？当然首先是要改教育目的。儿童上学不是为了升学，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把书本读破，为了把天下的所有知识都学完。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为儿童、青少年提供一个有利于他们身心正常发育的环境，使他们最终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独立的人”应该有健全的体魄，完美的道德，独立的个性，并且具有以下能力和素养(见普林斯顿大学对本科毕业生提出的要求)：

1. 具有清楚地思维、谈吐、写作的能力；
2. 具有以批评的方式系统地推理的能力；
3. 具有形成概念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 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5. 具有敢于创新及独立工作的能力；
6. 具有与他人合作的能力；
7. 具有判断什么意味着彻底理解某种东西的能力；
8. 具有辨识重要的东西与琐碎的东西、持久的东西与短暂的东西的能力；
9. 熟悉不同的思维方式（定量、历史、科学、道德、美学）；
10. 具有某一领域知识的深度；
11. 具有观察不同学科、文化、理念相关之处的能力；
12. 具有一生求学不止的能力。

显然，在美国的一流大学，对学生的能力培养已经成了教育的主旋律。那种以灌输知识、灌输教条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显得十分愚昧和落后。因此，改革教育内容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教学内容应该以学生的兴趣来设计，而不是以高考大纲为轴心。每个校长、每个教师、每个家长，每个教育官员都应该懂得，既然每个人的相貌都千差万别，那么每个人的心灵也自然各有千秋。社会的进步就体现在它不仅容忍、而且鼓励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思想的存在，而不是要制造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同一、单调。

让每一个受教育的人都成为独立的人，是基于以下的信念：每一个人都有生存的本能，都有追求幸福、自由的愿望，都有各自独特的天赋。在此基础之上，教育的功能就是要为他的生存本能提供必要的武装，也就是知识和能力；将他的愿望纳入符合人类共同发展的轨道，也就是建立道德观念；发掘他的天赋，使他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也就是符合个人特性的

职业、技能教育。从群体的角度来讲，就是要人人力争上游，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实现自己的最大价值。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每一个人的独特才能的充分发挥，是一个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大推动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二十一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有明显不同：每一个中国人，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或文化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任何一位家长，都应该把自己的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对待，而不是把他们当成自己的财产和附属品。家长要干涉学校的教育，不能让学校拿无穷无尽的作业和考试来迫害孩子，拿虚伪的道德说教来腐蚀孩子，拿苛捐杂税来剥削自己。中国的十三亿人口中，如果有百分之一是这样的家长，我们就有一千三百万新文化运动大军，不出二十年，这支大军就会打造出一千三百万个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中国人。他们之中如果有百分之一进入学术界，那就是十三万名新型“中国学者”。这些学者决不会象他们的前辈那样容忍学术界的腐败和平庸。

总之，新文化运动的根本在于教育革命，而教育革命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把被教育者当成一个独立的人来尊重，并且最终把他们培养成独立的人。这一点如果做不到，其它的一切都没有意义。

七 结论

本文与《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是姊妹篇，其主要目的有二：第一，挖出学术腐败的根源；第二，找到挽救中国学术界的道路。与中国学术界领袖们的看法截然不同，笔者认为中国学术腐败日趋严重的真正原因不是什么“社会风气”、“科技体制”、“政策导向”等等外界因素，而是中国学术界人士的自身素质。实际上，“世风日下”说是中国自古以来的陈年老调，根本不值一驳，而目前中国的“科技体制”和“政策导向”恰恰就是当前这些学术界领袖们自己制订的。不从自身寻找原因，反倒千方百计地把责任推给外界，正说明中国学者的集体和个人素质是什么水平。

本文给中国的学术界开了三个处方，分别针对学术腐败、整体学术水平低下、学者素质普遍较差这三个问题。对学术腐败，我实际只提出了一个对策，那就是废除院士制度。当然，废除了院士制度并不等于就根治了学术腐败，它不过是一个试金石，它的作用就是要看看中国的学术界到底还有没有救。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笔者并不认为院士制度本身有什么问题，而只是认为有问题的是“中国的”院士制度。假如中国的院士制度真的能够废除或被废除，那么其它治理学术腐败的措施也一定能够实行。这些措施，如改革大学管理体制，改革教授招聘、留职、晋级制度，改革研究生招生考试方法，改革学位授予制度，改革研究基金分配制度，对“学术不端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断绝学术界与官僚体制的联系，等等，都是在中国历史上或目前其它国家行之有效的，因此是有规可循的，并不需要再喋喋不休地讨论。中国学术界所需要的只是行动。

面对中国学术界学术水平低下这个问题，笔者提出了三条对策：第一，大学以教育学生为主，而不是以教授搞科研为主；第二，搞科研以应用研究为主，而不是要争取什么诺贝尔奖，争取什么 **Science**、**Nature** 论文。这两条对策的提出，既是考虑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实力，也是考虑到了中国整个社会的现实。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如果在这个家庭中，有的成员吃不饱穿不暖，而有的成员尽管明知道自己没有那个天赋，却衣轻驾肥，整天想着自己“成角”，那么这个家庭是不公平的，而那个想要“成角”的人是没有道德的。这么说，并不否认中国应该拥有世界一流学术机构的权利。对于有学术素质的人，国家是应该大力扶持其专心致志地搞学术的。而在目前的中国，这些人只能够在学术界体制之外寻找出路。这就

是我所说的第三条对策：另行建立一个独立的学术界。

实际上，要想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学术界，首先必须消灭那些制造了目前这些“中国学者”的环境和土壤，然后着手培养出一代代的新人。以教育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要培养具有新道德、新思想、和独立人格的人。他们能够拯救的何止是中国的学术界，他们会把整个中国推向峰巅。

如果我的《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引起了一些读者的悲观，我但愿本文能够给予他们希望。实际上，人类的历史就是在正义与邪恶、真理与谬误、光明与黑暗、崇高与卑劣、进步与落后、智慧与愚昧的搏斗中延续，几千年来一直如此。只要我们站在正义、真理、光明、崇高、进步、智慧的一边，只要我们用自己的眼睛仔细观察、用自己的头脑认真思考、用自己的良心真诚判断、用自己的身体努力实践，我们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就是在扎扎实实地搞新文化运动，我们就会“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俯仰无愧，为什么要悲观呢？应该感到悲观绝望的恰恰是腐败势力，因为他们注定要走向灭亡。

参考文献

(英文文献按作者姓名字母为序，中文文献按作者姓名拼音为序，同名之中，按发表日期排列)

Anonymous. Why China needs an NIH. Nature 428, 679. 2004 April 15.

biosys: 《这就是我们的杰出青年科学家》。《哈工大紫丁香 BBS》2003 年 8 月 6 日。

Haagmans et al. Nat Med. 10(3):290-293. 2004 Feb 22.

Nasar, S. (1999) A Beautiful Mind: The Life of Mathematical Genius and Nobel Laureate John Nash. Simon and Schuster Inc.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3-200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New York, NY., 2003.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 7 卷第 5 号 1920 年 4 月 1 日。

陈鲁民：《教师节随想：大楼·大师·大爱》。《千龙新闻网》2002 年 9 月 10 日。

陈诗余：《陈竺院士〈沁园春〉赏析》。《新语丝》2004 年 3 月 1 日。

陈永杰：《素质与知识》。《教育与探索》2000 年第 3 期。

邓琮琮：《杨福家：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有大楼大师，更要有大爱》。《中国青年报》2002 年 9 月 8 日。

杜若原、傅先萍：《抗 SARS 药物被找到：了不起的武大病毒研究中心》。《人民网》2003 年 5 月 28 日。

段玉明：《另一种国家研究》。《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1999 年 12 月号第 56 期。

范岱年：《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 年 8 月 21 日。

舛昕：《从哈佛到斯坦福》。东方出版社 1999 年第一版。

顾海兵：《院士制度——中国科技创新的障碍》。《搜狐视线》2002 年 12 月 19 日。

顾海兵：《人才问题上的六大误区》。《科技日报》2003 年 9 月 23 日。

何怀宏：《重温学者志业》。《二十一世纪》2000 年第 2 期。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第一版。

黄俊伟：《说过去的教授和现在的教授》。《书屋》2004 年第 5 期。

黄莺：《葛红兵：痛恨美男说法》。《都市快报》2003 年 11 月 6 日。

冀文海：《我国高等教育持续滑坡，8 成大学生对高校教育不满》。《中国经济时报》2001 年 3 月 28 日。

姜澎：《不甘长作编外“雇员” 上海九名博士生怒炒导师》。《文汇报》2004 年 1 月 19 日。

焦新：《“985”工程 向着世界一流大学挺进》。《中国教育报》2002 年 10 月 8 日。

金文明：《我答余秋雨》。《新民晚报》2003 年 7 月 8 日。

苦口药：《一个留美科学家的学生相当于几个中国的新院士？》。《新语丝》2001 年 8 月 21 日。

李敖：《播种者胡适》。《文星》第 51 期 1962 年 1 月 1 日。

- 李冰：《葛红兵开口为〈沙床〉辩白》。《北京娱乐信报》2003年12月1日。
- 李春芳：《知识创新工程百问》。《科学新闻》周刊 2002年3月18日。
- 李虎军：《“公开信”拔出萝卜带出泥 海外学者瞒天过海遭非议》。《南方周末》2003年2月13日。
- 李丽萍：《质疑“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一入选作品》。《中国青年报》2004年7月2日。
- 李健、张东操：《署名剽窃兼职过多 让院士和学术以外的东西脱钩》。《中国青年报》2004年6月3日。
- 李普：《悼李慎之一我们大家的公民教师》。《炎黄春秋》2003年第6期。
- 刘念才等：《我国名牌大学离世界一流有多远》。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网站。
- 刘清平：《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
- 闵维方：《在2003年北京大学校友工作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大学校友网 2003年11月19日。
- 欧阳斌：《中国学术纯度加剧下滑》。《凤凰周刊》总第133期 2003年12月25日。
- 缥缈孤鸿：《可怜的中国物理！可怜的科大、北大、南大、复旦、清华！》。《天涯社区-关天茶舍》2004年5月12日。
- 浦树柔、戴廉：《两院院士：缺乏“自主创新核心技术”是中国软肋》。《中新网》2004年6月7日。
- 任荃、王丹红：《中国科技界：直面现实》。《文汇报》2004年5月6日。
- 上海技物所：《中美科学家合作研究金属和半导体纳米线》。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网站新闻。2004年3月21日。
- 沈铭贤：《李约瑟与爱因斯坦——“李约瑟难题”的两种不同的回答》。《学术月刊》1996年第4期。
- 时捷：《两院院士选举争论不断 选举为何退化成“选战”》。《国际先驱导报》2003年9月8日。
- 孙自法：《科协呼吁改称“学术腐败”为学术不端或不良行为》。《中新社》电 2003年1月23日。
- 孙自法：《中国科协披露当前中国学术七大“不端行为”》。《中国新闻网》2004年2月9日。
- 孙自法：《培养大师级科学家 中科院启动“爱因斯坦计划”》。《中国新闻网》2004年3月24日。
- 唐德刚：《写在书前的译后感》。见《胡适口述自传》。
- 吴瑞：《提高中国科学研究的产出率面临挑战》。《自然-中国之声专刊》2003年12月18日。
- 吴珊：《神舟 你有多少含金量？》。《青年参考》2003年10月16日。
- 武书连等：《2004中国一流大学评价揭晓 15所大学入围》。《中国高校网》2004年1月14日。
- 王勇：《科学研究在于人——艾伦·麦克迪尔米德访谈录》。《文汇报》2003年12月8日。
- 王渝生：《中国科技百年》。《中国青年报》2000年1月1日。
- 奚彬、翟伟：《人大代表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新华社》2002年3月12日电。
- 席泽宗：《李约瑟论〈周易〉对科学的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4期。
- 夏红卫、程瑛：《剑桥校长剖析剑桥奇迹》。《北京青年报》2002年4月15日。
- 闲云野鹤：《评亦明的“把反学术腐败的斗争进行到底”》。《新语丝》2003年2月12日。
- 肖斌：《现行的院士制度不废，中国学术无望》。《新语丝》2003年4月27日。
- 谢湘、周欣宇：《SARS面前中国科学家打了败仗》。《中国青年报》2003年5月26日。
- 谢泳：《“李约瑟问题”可能来源于吴景超》。谢泳居网站。
- 徐彬：《“疾控中心问责事件”再追踪》。《南方周末》2004年7月8日。
- 徐有智、叶辉：《浙大实施985工程巨变：科研经费每年增长1个亿》。《光明日报》2003年5月13日。
- 杨福家：《一流大学需要大楼、大师与“大爱”》。《北京青年报》2002年9月17日。
- 杨弘远：《治理学风要抓住“病根”》。《光明日报》2002年4月5日。
- 杨振寅，等：《反思当今的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
- 央视国际：《阻击SARS的女科学家——军事医学科学院博士陈薇》。2003年6月3日。
- 亦明：《北大的学生，清华的教授，诺贝尔奖得主》。《新语丝》2002年12月17日。
- 亦明：《流氓教授与骗子学生(三)》。《新语丝》2003年2月22日。
- 亦明：《超一流梦想，不入流的作为：评清华大学计划在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新语丝》2003年4月13日。

- 亦明：《是东施效颦，还是邯郸学步：评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被哈佛校长拒之门外》。《新语丝》2003年5月15日。
- 亦明：《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五)：北大校史之竖刁自宫篇》。《新语丝》2003年6月21日。
- 亦明：《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六)：北大校史之易牙烹子篇》。《新语丝》2003年6月25日。
- 亦明：《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七)：北大校史之开方背亲篇》。《新语丝》2003年6月30日。
- 亦明：《中国院士制度的演变》。《新语丝》2003年7月13日。
- 亦明：《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一)：丧失了社会良心的院士》。《木子网-时政述评》2003年7月20日。
- 亦明：《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二)：欺世盗名的院士》。《木子网-时政述评》2003年7月27日。
- 亦明：《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三)：蒙骗政府、愚弄人民的院士》。《木子网-时政述评》2003年8月2日。
- 亦明：《中国学术界的海龟与土鳖之争》。《木子网-时政述评》2003年8月11日。
- 亦明：《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木子网-时政述评》2004年1月26日。
- 佚名：《学术腐败因何而起？》。《Beijing Review》2003年34期。
- 佚名：《五位“院士代表”痛斥学术腐败》。《北京青年报》2004年3月12日。
- 佚名：《陈薇：在偶然中找寻必然》。《人物》2004年3月23日。
- 余秋雨：《被“咬”者的回答》。《深圳商报》2003年6月25日。
- 袁瑜：《教育呼唤蔡元培》。《中国教育》2003年第4期。
- 张瑾：《贺福初院士：病毒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京华时报》2003年6月4日。
- 张静：《科学界有七种不道德行为》。《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6月27日。
- 张鸣：《曾经有过的高教大跃进》。《世纪中国》网站。
- 张其璠：《许智宏谈中国院士水准问题》。《科学时报》2001年8月31日。
- 张寿荣：《我的人生》。《中国专家网》张寿荣(院士)个人主页。
- 张寿荣、郗小林：《院士制度不是误区》。《科技日报》2003年12月9日。
- 赵利：《“863”成果览萃》。《中国国防报》2001年3月7日。
- 赵玥：《北大精英自嘲“废物”：名校不能承受之重》。《千龙网》2004年5月12日。
- 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简介》。中国科学院网站。
- 中科院微生物所：《陈竺副院长来我所宣布所领导班子组成并作重要讲话》。微生物所网站新闻2004年3月16日。
- 朱大可、拉拉：《木子美·葛红兵现象意味着什么？》。《文化研究网站》2003年12月11日。
- 转烛：《居然敢叫“沁园春”》。《新语丝》2004年3月3日。
- 宗宝泉、赵如江：《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创新发展纪实之人才篇》。《科技日报》2004年2月26日。
- 左春明、周月红：《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向世界一流大学跨越》。《中国教育报》2003年4月11日。